

理论与实践

LILUN YU SHIJIAN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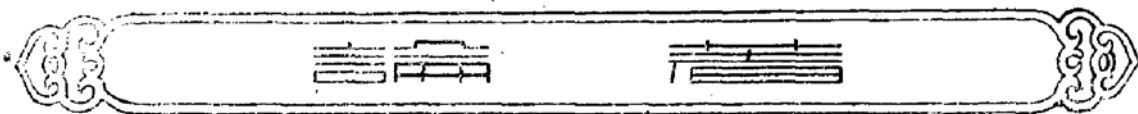
1959

目录

- 坚决做无产阶级革命派 杜国庠 (1)
- 人民公社伟大未来的重要基础 吳 修 (5)
- 从樟市公社社办经济和福利事业看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和伟大前途
- 坚决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杨奎章 (12)
- “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欺骗性 张 进 潘 擷 馮訓瑜 (17)
- 坚决挖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张 涛 謝炳生 (21)
- 广州市场的回顾和展望 陈 克 (24)
- 广东原始社会初探 中山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研組 (29)
- 試論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及其成长 吳宏聰 (36)
- 小論个人主义的品种 燕 如 (45)
- 热情与冷淡 賀 青 (47)
- 介紹“伟大希望所在”(书刊評介) 李昌实 (49)
- 教育革命好得很! (讀者中来) 中山大学中文系
四年級学生 裴汉康 (53)
- 駁“吃亏”論

动 态

省高教局和省社联筹委会將組織科学工作者下乡参观訪問
华南师范学院將举行第三次科学討論会
广东师范学院,訂出1960年科学研究初步规划
广州市考古学界討論广东原始社会史問題
中山大学热烈举行科学討論会



坚决做无产阶级革命派

杜国庠

要怎样做一个优秀的革命者？这是许多同志关心的一个问题。孔子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老实说，我活了这么些年纪，还不能说“从心所欲，不踰矩”，还要继续学习。今天，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无产阶级事业，要求我们学习做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大家知道，我们的党是一个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政党，因而它在中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中有崇高的威信。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党的队伍不断壮大起来，许许多多共产党人，克尽忠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憎恨敌人，热爱人民；吃苦在前，享福在后；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们为党的、阶级的、人类的解放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种情况，这就是说，我们的党是生活在一个有着极为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国家，因而有不少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带着各种不同的目的和动机，加入到我们党内来。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在党的教导下和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成为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人；但是还有一些人，没有改造好，他们不是忠心耿耿为党、为人民工作，而是私心物欲很重；他们不是疾风之下的劲草，而是池塘之上的浮萍，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他们不是为党的事业矢志不移，而是立场不坚定，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发生动摇；他们不是做党的驯服工具，而是经常要同党闹对立，唱对台戏。当前党内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是这号人物。党要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他们却要反对；党热情赞助、支持并积极领导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也反对；党要政治挂帅，要加强党对一切经济文化事业的领导，他们也不以为然。总之，他们另有一套，不一而足。但是说来说去，我们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分歧，根本是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党的领导问题，二是关于革命群众运动问题。

我想，要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首要的一条是要坚决地、无条件地、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接受党的纲领、路线，做党的驯服工具，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这应该说是一个常识问题，也是党对每一个党员的起码要求。须知：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最伟大的、最壮丽的、而又最艰巨的事业，也是我们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实现这个目标，要一步一步来做，但又要贯彻始终，不能停顿。毛主席早就说过，党领导下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包括两个阶段，即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指导这整个革命运动的正确方针，一方面是要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精神，把两个不同阶段的革命性质、任务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要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的精神，把两个革命密切联系起来，在民主革命阶段就

要尽可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民主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后，便接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几十年来，我们党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正是这样做了的，而且做的完全正确。远的不说，光说解放后的事实，就足以说明党如何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正确地掌握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如何正确地指导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大家记得，在一九五二年年底，当恢复国民经济和肃清封建残余的任务基本完成后，党就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了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这是一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指导下，非常迅速地在一九五六年底就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即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接着，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一九五七年经过伟大的全民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在这方面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样，是不是革命大功告成了呢？不是的，还要不断革命。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还有许许多多工作要做。接着，党在一九五八年春天又及时地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样就明确地给全党、全国人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以便争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高速度？我们应该看到，我们国家经济文化落后，亿万人民几千年来受尽一切反动势力的压迫剥削，当他们一旦成为社会的主人，要求改变这种一穷二白的面貌、要求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的心情自然是十分迫切的，如果不采取高速度发展经济文化事业的方针政策，我们党就会脱离人民群众。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我国外部还有帝国主义，还有战争威胁。如果我们尽快地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就能大大增强以苏联为首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大大增强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摆在我们面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高速度发展建设事业，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因为它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点和要求，它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性。事实已经证明，这条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一九五八年和今年所出现的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和继续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大发展以及人民公社化的实现和巩固，正是全国人民在这条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意气风发、英勇斗争的结果。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将继续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荣旗帜前进，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最主要的战斗纲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为坚持贯彻党的总路线而斗争。可是有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提出什么“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纲领。我们党，从来都没有把“自由、平等、博爱”列入党的纲领。事实证明：我国的民主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按照无产阶级的纲领来进行的。当一个共产党员举起资产阶级的破烂旗帜，来与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对抗的时候，也就彻底地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立场了。

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坚持和贯彻党的无产阶级纲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应该站到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前列，热情地支持和领导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要这样，就要坚决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一切工作中的根本路线。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认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

的主人、历史的創造者。工人階級必須依靠本階級的群众力量和全体人民，才能实现自己的共产主义革命的任务，解放自己，同时解放全体人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創造性愈高，工人階級的革命事业就愈发展。这就是我們党的群众路綫的深刻的理論基础。这就是我們的唯物史观。因此，我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都坚决貫徹党的这条群众路綫，坚持大搞群众运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以及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針，都是党的群众路綫在社会主义建設中的应用和发展。“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有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才能出现轰轰烈烈的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的局面。不能設想：离开了人民群众，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因此，我們党和毛泽东同志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从来是采取了热情歌頌、支持和积极领导的方針，同群众一道，作他們的响导，使他們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是，我們党内的一小撮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却对革命的群众运动采取了资产階級老爷式的或小资产階級知識分子的輕浮态度，站在一旁，肆行嘲笑，大泼冷水。他們認為經濟建設不能搞群众运动，一搞就会“违反客观經濟規律”，会出“乱子”。当然，經濟工作應該尊重客观經濟規律，在革命和建設中群众运动的具体形式也会有所不同，但是他們却没有看到：只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創造性，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們的主观能动性，以充分利用客观經濟規律。共产党人應該成为充分利用客观經濟規律的主人，而不應該变为客观經濟規律的奴仆。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为什么反对在經濟建設中搞群众运动？根本原因是他們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和智慧，認為經濟建設是一种“神秘”的事，只有“专家”才能搞，而“沒有科学技术”的广大人民群众是无能为力的。这是他們的资产階級偏見。其次，他們沒有看到，任何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党站在群众的前列，同群众一起前进，就能够及时发现缺点，并加以克服。这就保證了群众运动的正常发展。搞經濟建設，也是这样的。

革命的群众运动一經形成，其力量就如“暴风驟雨，迅猛异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因而，它就将冲破一切保守的甚至反动的传统因袭的束縛和陈旧的规章制度，去創造、促进新生事物，就是說，按照生活本身的邏輯，为我們的革命事业找到各种适当的新的形式。任何人想給它规定一个框框，都是不可能的。一切新生事物总是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斗争而出现、成长起来的。人民公社的产生，正是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的产物，是我国政治經濟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重大胜利。事实已經証明，人民公社是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强有力的武器；历史也将証明，它是我国将来农村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社会組織形式。馬克思列宁主义告訴我們，要用理論联系实际的方針，而不要光从书本上現成的公式出发，来观察、解决实际生活中的新鮮問題，这就是說，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实际斗争来运用和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人民公社化运动，說它违反社会发展規律。实际上，他們却远远离开了馬克思主义，在革命的群众运动面前，在真理面前，或則张惶失措，或則指手划脚。可见，怎样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是无产階級革命家和资产階級革命家的分水岭。

作为资产階級革命家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为什么要拿出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群众运动的资产階級綱領来对抗党的綱領，来对抗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呢？他們同我們之間，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歧呢？归根到底是世界观問題。也就是說，这是两种不同世界观的斗争。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党的綱領、路綫，實質上是以他們的资产階級世界观来对抗党的无产階級世界观。

这个现象，不是偶然的。这应该从我国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来理解。当前，我国还有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刚刚在改造。因而，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大量事实说明：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当社会主义革命愈益深入、社会主义建设愈益发展、广大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愈益坚定的时候，资产阶级愈益感到不安，因而他们采取各种办法来反对社会主义也就不奇怪了。这种资产阶级反抗社会主义的斗争，不能不影响到我们党内的一些不坚定分子。党内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阶级斗争尖锐的某些时机，就往往从党内来进行反对党的路线、纲领的活动。当前我们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正是这种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企图按照他们的资产阶级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所以，我们就要坚决粉碎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保卫党的领导，保卫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世界观的斗争是当前思想斗争中最突出的问题。改造世界观是我们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作人员改造思想最根本的任务。我们要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就要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自己的业务实践，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而不要以为自己不再需要改造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革命事业的动摇以至走到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可耻的道路上，正是他们拒绝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自己的一种悲剧性的结果。

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因此，世界观不是空洞的、抽象的东西，而是贯彻在人们对待一切事物的根本观点上。资产阶级革命家从他们的反动的阶级立场、狭隘的阶级利益出发，以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事物，不敢正视客观存在，更害怕客观存在的发展；因此，总是主观的、静止的和片面的。用这种观点来对待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就必然要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领导下的革命的群众运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家从革命的、大公无私的阶级立场出发，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事物。我们要揭示客观存在，更要不断地推动客观存在的发展；因此，我们总是客观的、发展的、全面的。而党的领导，党的纲领、路线，又总是这样反映着社会现实，并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来彻底实现各个革命时期的政治纲领，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所以，我们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决地拥护党的领导，热情地歌颂和支持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勇敢地站到群众运动的前列，领导群众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实现党的政治纲领。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世界观，使每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都能够把党的、革命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把个人的问题、个人利益摆在服从的地位。少奇同志说：“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的最高原则，”又说：“一个共产党员，能够使他个人的利益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是考验这个党员是否忠于党、忠于革命与共产主义事业的标准。”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应该这样，忠实地做党的驯服工具。任何一个革命工作者，也应该用这个精神来鞭策自己，不要自暴自弃；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何况我们是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人。

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说我们脸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洗脸，地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扫地。一个人经常自觉地进行自我批评，是很重要的。我愿同大家互相勉励，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十二月十一日

人民公社伟大未来的重要基础

——从樟市公社社办经济和福利事业看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和伟大前途

吳 修

樟市公社是一个因为迅速改变了原来又穷又白的山区经济面貌而著名全省的人民公社。这个公社的社办经济，可以说是从“空地”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它特别显著地体现着人民公社的无比的优越性和无穷的生命力。因为公社社办经济事业（包括社办的工厂和企业）和福利事业的发展 and 壮大，是公社的伟大未来的重要基础，是我们的伟大希望所在。

本文将根据樟市人民公社社办经济事业和福利事业高速度发展和壮大的具体材料，说明公社一级经济的特点、作用和发展前途，以驳斥右倾机会主义者所说的“人民公社同原来的高级农业合作社没有什么区别”、“人民公社名存实亡”等荒谬论调，澄清对目前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的人民公社的各种错误看法。

樟市位于广东省韶关市的西南，是个山高水寒，又穷又白的山区和半山区，虽然拥有丰富的资源，但在人民公社化前，由于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规模小，资金少，劳动力不足，不能充分利用和开发。因此，在合作化阶段，这个山区和半山区的人民，生产和生活水平虽然比解放前大大发展和提高，但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的经济面貌，生产的门路不多，生活水平还很低。从去年四月成立了联社、不久发展为人民公社的一年多以来，在公社经济全面大发展的基础上，樟市公社的面貌迅速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办

经济也迅速发展和壮大。

樟市公社的社办经济，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以飞跃的速度发展起来的。

在公社化以前，这个地区，属于高级农业合作社的企业只有机缝、木器、铁器等三个手工业社，一个水上运输社和一个捕鱼组。共有147个劳动力，全部用手工操作，没有动力设备和机械设备，每年产值仅约13万元。陆上交通运输工具只有一部很少使用的单车，因为这里没有一寸公路，小路连单车也不能通行。这些就是樟市公社建立时社办经济的全部“家当”了。经过了联社、特别是建立了人民公社之后，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由于党的领导和公社干部以及全体社员的艰苦奋斗，公社的社办经济，已经从五个单位发展到三十多个单位，今年产值预计达到2,966,756元，到今年十一月底已完成了260万元，为1957年上述高级社五个单位的产值13万元的22.6倍。

如果从目前樟市公社社办经济的经营范围、发展规模和技术设备来看，那就更不是高级社时期所能比拟的了。

目前樟市公社社办的三十多个经济单位，基本上可分为五类：

第一类，是以提供原材料为国家工业化和社办工业服务的，有：打石场、伐木场、砖瓦厂、煤矿、钢板厂、火药厂、木炭厂、榨油厂、松香厂和副业队（如砍竹）。

第二类，是为公社农业生产服务的，有：铁木农具厂、竹器厂、石灰厂、肥料厂、

拖拉机站。

第三类，是为公社各生产部门服务的，有：航运队、造船厂、搬运队、基建队、汽车组、发电站。

第四类，是为社员生活服务的，有：服装加工厂、副食品加工厂、食堂、五金修理厂、理发馆。

第五类，是种苗基地和副食品商品生产基地，有：农场、畜牧场、果园、苗圃、捕鱼队、三鸟孵化房、蔬菜队和造林队。

全部社办经济共有劳动力1,626人，其中工业786人，占48.2%，农业326人，占20.1%，林业133人，占8.2%，其他381人占23.5%。社办经济已由全部手工操作进入了半机械化，并正在向机械化过渡。目前樟市公社社办经济除了拥有7台拖拉机共215匹马力，能负担全公社耕地的十分之一外，已拥有水电站发电能力80多瓩，机械动力788匹马力，发电机6部，电球5部，四尺六寸车床一台。交通运输方面，现已修通了社内公路140华里，有两部载重汽车，一艘电船，运输能力300吨的木帆船和马车队、牛车队等。原来工作最繁重的伐木场，已经改用电锯采伐，并架设了长达1,200公尺的空中运输线和铺设了长达六华里的木轨。锯木厂、农具厂和打石场，都装设电力或部分机械设备。

樟市公社全社总产值、社办经济和大队经济产值今年比去年的增长情况如下：

| 年度 | 全社总产值 | 增长% | 大队经济产值 | 增长% | 社办经济产值 | 增长% |
|----|-------|-----|--------|-----|--------|-----|
| 58 | 398.8 | 100 | 277 | 100 | 121 | 100 |
| 59 | 691.3 | 173 | 394 | 142 | 296 | 244 |

(单位：万元)

上表说明：社办经济是在全公社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取得的，一九五九年与一九五八年相比，大队经济的发展是迅速的，而公社一级经济比大队经济的发展更为迅速；这种“水涨船高”的情况，是完全符合公社

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全体社员的利益的。

从上述情况中，我们还看到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那就是社办经济的发展，除了必须考虑当地的资源，贯彻因地制宜的原则，而且由于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社办经济必然要在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针指导下，形成一个以当地的主要资源为中心的经済体系。这种经济体系的形成，不论在发展社办经济方面，或在更大规模更高速度上促进大队经济的发展，壮大全公社的经济，为完成从小集体向大集体的转变创造条件方面，都具有深刻的意义。而樟市公社社办经济高速度发展，正是和这一点分不开的。这是全公社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公社经济无穷生命力的一种表现。

在公社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基础上，社办的福利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增长。樟市公社目前举办的福利事业主要的是卫生医疗事业。公社开设了3间医院，17间产院和5个卫生所，共有病床56张，12个医生，6个医士，56个医务人员。社员全部免费医疗。今年仅包医一项，公社支出的费用（包括医药费和医务人员工资）即达15万元，相当于各大队上缴给公社的积累四分之一。此外，还举办了敬老院、幼儿园、为全公社的托儿所培养保育员的训练班以及文化教育事业等。

二

上述樟市人民公社社办经济事业和福利事业的概况，已经足以说明目前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的人民公社仍然明显地表现其一大二公的特点，表明公社比高级农业合作社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和无穷的生命力，它对明年农业生产的更大跃进，对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起着巨大的作用。因为樟市公社的情况表明，社办经济事业和福利事业是在各生产大队生产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而又为进一步发展各生产大队的生产服务的。所以，社办经济事业和福利事业，

不仅能够促使公社一級經濟的迅速发展和壮大，而且是发展和壮大全公社的經濟以及逐步地由小集体所有制（即目前生产队一級的所有权是基本的）轉变到大集体所有制（即将来公社一級的所有权是基本的）的重要基础。

我們从上面樟市公社社办經濟事业的概述中，知道这个山区和半山区，在公社化前是非常貧困落后的，公社化后的一年多，由于社办經濟的发展和壮大，已經实现了半机械化，并正在向机械化过渡。社办經濟的半机械化、机械化，一方面有可能更高速地发展公社經濟，另一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方面，是使全体社員更深刻地認識提高生产和改善生活的道路。因为从社办經濟的发展中，他們看到只靠两只手和老一套生产技术，是不能創造出更高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只有实现半机械化、机械化，大搞技术改革，才能創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样，社办企业的半机械化、机械化，就有助于促进全公社的半机械化、机械化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來說，公社社办經濟对公社的发展具有一种先鋒队的作用。

我們以樟市公社社办的三个主要經濟单位为例，从比較中說明劳动生产率高低情况：

社办伐木场在半机械化前，运木是用人力肩挑的，每人一次約挑80斤，一天最多挑四次，共挑320斤，不到半个立方米。现改用木軌車和空中运输綫，木軌車用一人管理，一次可装500斤，一天能运五至六次共运3,000斤，劳动生产率提高近十倍；空中运输綫每3分钟可运一次，每次可运一个立方米（1,200—2,000斤），劳动生产率提高三百多倍。

鐮木厂过去用手工操作时，鐮木场共有60个工人，每天完成265立方米，平均每人每天4.4立方米。使用电鋸之后，减少到六个工人，每天能完成250立方米，平均每人每天41.66立方米，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近十倍。

农场的劳动生产率与同条件的和平生产大队的比較如下表：

| 項目 | 单位 | 和平大队 | 社办农场 | 农场比大队增长 % |
|----------------|----|--------|--------|-----------|
| 每个劳动力每年平均生产粮食数 | | 2,475斤 | 4,002斤 | 61% |
| 平均每个劳动力产值 | | 313.7元 | 548.1元 | 78% |
| 按人口平均每人产值 | | 117元 | 259元 | 121% |
| 每个劳动日价值 | | 0.87元 | 1.41元 | 62% |

社办农场是公社直接經營的經濟单位，有一套更为完善的經濟管理制度，能更好地贯彻执行“八字宪法”，大搞技术改革，因而有着比生产大队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对各生产队起着示范作用。

社办农场是由和平管理区的官屋、李屋、拱桥等生产队联合建成的，共有耕地2,540亩，其中水田1,950亩，旱地290亩，园地300亩，由于土质貧瘠，且过去耕作粗放，去年水稻平均亩产量仅420斤。建立社办农场之后，由于坚决贯彻“八字宪法”，大搞技术改革，今年水稻平均亩产量840斤，增产一倍。青年生产小队今年早造种29.5亩，平均亩产量770斤，比去年同期平均亩产量180斤增产四倍。今年公社党委曾先后六次組織各生产大队的干部和社員到农场参观，打破了对改土、早播、合理密植的保守思想，帮助各生产大队开展技术改革。

樟市公社的社办經濟，已經成为全公社經濟更大规模更高速发展的基地。从社办工业、商品量的比重、資金的积累以及經營的范围和规模，可以看出这种基地的作用。1959年1—7月，全社工业的总收入1,111,482元，其中社办工业收入为922,862元，占83%，各生产大队工业共收入188,620元，仅占17%。社办經濟商品生产特別发达，以1959年第一至第三季度实绩和第四季度預計数为依据，1959年全年社办經濟的主要商品产值占全公社主要商品总产值的55%，大队經濟的主要商品产值仅占45%。社办經濟的

商品生产又以工业生产为主，工业商品产值约占社办经济商品总产值的80%。社办经济能以更大的规模来经营生产，如社办伐木场，1958年采伐木材25,000立方米，今年十一个月采伐木材28,000立方米，比公社化前罗坑社和留坑社每年采伐1,000立方米增加了28倍。1958年初，一个月出售木材四万多元，解决了各生产大队春耕生产资金的困难，并为公社积累了发展其他工业的资金。从社办工业经营的范围和规模，更表明社办工业已经略具一个相互联系的体系的雏形，为进一步发展工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目前樟市公社已经经营了四个为发展全公社的农林牧业服务的基地：（一）技术改革的基地（即社办农场）；（二）商品生产基地；（三）公社直属企业的口粮基地（包括解决林场、农场、畜牧场职工的口粮）；（四）种苗、饲料基地。现在樟市公社党委正以社办经济为物质基础，规划实现四化（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目前，在水利化方面，公社化以后，樟市公社的耕地，已经基本上免除了旱灾的威胁，并规划在1960年实现田园化和更大规模地利用樟河的水利资源。在机械化方面，樟市公社在今年就已经购回了七部拖拉机，机耕能力可负担全社耕地的十分之一，社办工业已经实现半机械化，并正在向机械化过渡。在电气化方面，公社投资兴办的已有一座水力发电厂，最近又以合办的形式帮助罗坑生产大队新建一座水力发电厂，为继续发展工业生产提供了动力，同时解决照明用电问题。

由此可见，社办经济在总产值的比重上目前虽然还小于各生产大队的经济。但从它的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能够更大量的积累资金（即主要是发展商品性生产），可以更高速度的发展和壮大，可能迅速实行半机械化、机械化，以及在发展全公社经济和社办福利事业中的巨大作用等方面的特点，说明它已经成为发展全公社经济的先锋队，也

是公社伟大未来的重要基础。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所指出：“目前人民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公社所支配的公积金等，还不很多，但是正是它们代表着我国农村的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发展前途”（“人民公社万岁”）

公社一级的经济，在帮助穷队赶富队方面，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成为逐步缩小和消灭穷富队之间差别的杠杆。

樟市公社的十三个生产大队之间，由于过去的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在公社化以前，存在着穷富悬殊的情况。如比较富裕的留坑大队，1957年每个劳动日值1.20元，全年平均每户收入329元，平均每人全年收入68.50元；而比较穷的南约大队，劳动日的分红只有0.62元，平均每户的全年收入为197.62元，平均每人全年收入只有41.03元，相差将近一倍。为了帮助穷队赶上富队，逐步缩小穷富队之间的差别，樟市公社建立初期，即利用公社的积累为穷队清还国家贷款四十多万元，并根据穷队经济落后的原因，从资金、生产资料、劳动力等方面给予帮助。今年上半年公社又拨出十多万元的资金帮助光明、南约、径口、上下璠等较穷的生产大队，并帮助他们解决种子、肥料、农具等的困难，支援他们发展农业生产。对于发展副业生产有困难的穷队，公社调拨了大批种苗：计猪苗248头，三鸟3,581只，鱼苗35万尾。根据穷队经济基础薄弱的具体情况，公社一方面对于穷队上缴积累的比例作了适当的调整，一方面下放适于大队经营的工厂，以增加这些穷队的收入。同时，帮助穷队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以改变自然条件。如支援光明大队修筑一条长达30华里的水圳，解除了该大队三分之一的耕地受旱的威胁，使今年早稻丰收，总产量从去年的55万斤增加到80万斤，变基本足粮为余粮。公社投资修筑的罗坑公路，对发展山区交通和生产的作用也很大。

一年多来，樟市公社較穷的罗坑、光明、南約、径口等生产大队，在国家和公社的援助和照顾之下，得到了很大的鼓舞，坚决自力更生，发奋图强，以冲天干劲发展生产。现在，这些穷队同富队之间的差别已经明显地缩小了，有的穷队还赶过了富队。如径口大队经过公社的帮助，苦战一年，每人平均收入已经从去年的40元增加到120元，光明大队1957年每户平均收入189元，比被称为老牌富队的留坑大队（每户平均收入329元）相差140元，今年一月到九月增加到271元，与留坑大队每户的收入水平已相差不多。原来全公社最穷的上下瑶大队，1958年每户平均收入只有165元，今年一至九月，每户平均收入激增到369元，比富裕的留坑大队每户平均收入289元还多80元。

在帮助穷队赶富队同时，樟市公社还积极帮助富队进一步发展生产和提高社员生活水平，促进生产大队生产的全面的更大跃进。

所有这些，都集中地表现公社一级的经济在发展全公社经济中的作用，从而证明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的特点，并不因为目前实行“三级所有制”而有所改变，相反的，在我国农村目前的经济条件下，实行“三级所有制”并以生产大队一级为基本的所有制，是完全符合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正因为如此，樟市公社才有可能在一年多的时间，在全公社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发展和壮大公社一级的经济，从而创造了从生产队基本所有制向公社基本所有制转变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社办经济和在社会办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举办的社办福利事业，不但有利于提高劳动力的利用率，而且是提高社员政治思想觉悟的活教材。

樟市公社根据公社经济的可能和绝大多数社员的要求，始终坚持支出巨大的包医制，是为了保证社员的健康，增进社员的体

质，从而提高劳动力利用率和提高社员的政治觉悟。从今年一月到七月，社办的医疗机构共接待病人160,402人次，十七间产院共接生婴儿1,100人，个个都健康。此外还组织了一支70人的防疫队，深入群众检查勾虫病、血吸虫病、疟疾和皮肤病，现在正在对患者进行全面治疗，争取今年内可以根治。过去为害最烈的血吸虫病，现在已经基本消灭，许多因病不能参加劳动的人，病好了都积极参加生产，提高了劳动力的利用率。由于公社举办的幼儿园、托儿所以及其他福利事业，解除了妇女的家务的束缚，积极参加生产。根据1959年9月的统计，全公社有6,329个妇女投入各项生产活动，其中参加农业生产的有4,298人，占全公社农业劳动力、半劳动力10,336人的41.6%。

由于社办经济事业所起的这种作用，使全体社员更坚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心和将来走向共产主义的信心，更相信党的领导和更拥护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更看清楚人民公社发展的前景。

樟市公社社员陈九的故事，对说明这个问题是很有代表性的。

陈九过去曾从苏联电影中看到苏联集体农庄庄员用拖拉机耕作，认为那是假的，说：“映画（广东话称电影为“映画”）上的东西是画的，想有什么就画出什么来。”一九五五年高级社专派他到广州去参观苏联展览馆，他从展览馆中亲眼看到不是画的而是真正能够开动的拖拉机了，当然不得不相信拖拉机能耕田，但他回来对人說，拖拉机是真的，可不是我们使用的。他说：“那样的铁牛，又重又笨，过得了乌石街，也过不了北江，过了北江，也来不了我们村里。”那时从乌石到樟市还没有一寸公路。今年公社购买了四部拖拉机，铁牛跑到了陈九家的门口。这件事给了陈九深刻的教育，他以后逢人便说：“共产党真了不起，说得到就做得到，以后一定听共产党的话”。

社办的福利事业，除了提高公社的劳动力利用率，也使广大社员在回忆对比中大大地提高了政治思想的觉悟。很多女社员，从烦琐的家务中解放出来，参加劳动之后，心情舒畅，干劲冲天，什么工作都跑在前头，在去年夏收夏种中全公社共选出1,300个能手，其中女能手占1,200多人。由于直接参加劳动和文化学习以及党的培养教育，妇女的觉悟迅速提高，据1959年4月的统计，大队以上的女干部有113人，小队的女队长、记分员有200多人，樟市党的组织中已有女党员63人。

女社员潘金莲因患妇科病，长期来得不到医治，不能参加劳动，家庭生活困难，闹得夫妻不和，非常痛苦。今年四月间公社送她到韶关医院治疗，用了一千四百多元的医疗费。她病好出院回家，千感万谢说：“若不是共产党领导办起人民公社，我没有命了。现在医好我的病，保证积极生产。”

在体制下放大辩论时，有人主张取消社办的经济事业和福利事业，但是绝大多数社员坚决反对，他们说：“没有了社办经济事业和福利事业，还成什么人民公社？”很多社员都认为：什么都好商量，要取消包伙食和包医疗这两条那是万万不能的。

樟市公社的社员就是这样从社办经济事业和社办福利事业中亲身体会到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好处，看到了人民公社发展的前景，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坚定了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

象种子中的胚胎，公社所有制的经济事业，由于它包含着某种程度的全民所有制成分，由于它的迅速发展壮大和它对于促进全公社经济更大规模更高速度发展所起的作用，它就成为人民公社的命根子，是人民公社伟大未来的重要基础，是我们的伟大希望所在。它已经以其不容置辩的事实，显示着自己的无比的优越性和无穷的生命力，而且在实现从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向公社的基本

所有制，以至将来在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中，必将更加雄辩地显示着自己的这种优越性和生命力。从樟市人民公社社办经济事业和福利事业的上述概况中，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三

在同一客观事物的面前，由于人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就必然要得出不同的结论，在对待人民公社问题上，也不例外。我们对人民公社得出了上述的结论，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了达到他们反对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否定大跃进的成就，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却得出和我们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们说什么公社体制下放，实行三级所有制，“人民公社同原来的高级农业合作社没有什么区别”、“人民公社名存实亡”，总之，极力污蔑和诋毁伟大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另外有一些同志，由于存在右倾思想，在人民公社问题上，也存在类似的想法。有必要根据上述樟市人民公社的具体材料，驳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人民公社的毫无根据的攻击，澄清某些同志对人民公社的各种模糊以至错误的看法。

樟市人民公社的事实表明，人民公社在体制下放之后，并不发生什么“名存实亡”的问题。如果要论“名”“实”的话，象樟市人民公社所显著表现出来的“组织规模大，活动范围广”，公社所有的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公社所支配的公积金等的存在等等，不就是最雄辩的“实”吗？同时，既然这个“实”是高级社所没有也不可能具有的，人民公社与高级社之间的区别，不是十分明显的吗？

刘少奇同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中指出：“在人民公社内部实行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其中所说的农，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业），在组

織生产的同时又組織生活，实行国家在农村的基层政权机构和公社的管理机构的合一，这些都是原来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所沒有的。尤其重要的是，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现在虽然还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生产队（相当于原来的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是基本的，公社的所有制是部分的；但是，这部分的公社所有制是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所有的，它包含着某中程度的全民所有制成分”。由此可见，由人民公社在体制下放之后，不但名存实存，而且这个“实”具有一种无比的优越性和无穷的生命力，它是高速度发展公社經濟，是公社从小集体向大集体的轉变，和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物质保証。它在体制下放以后，就开始显示其巨大的威力，迅猛地改变着我国农村的經濟面貌和精神面貌。樟市山区和半山区在公社化的一年多中，比高級社的一年多中所发生的变化更快更大得多，就最生动有

力地說明人民公社具有比高級社更大的优越性，并且正是它代表着我国农村的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发展前途。

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从他們的阶级本能出发，面对着从东方升起的光芒万丈的朝阳，睜不开眼睛或者不敢睜开眼睛，却在那里瞎說什么“人民公社名存实亡”、“人民公社同高級社没有什么区别”，这就暴露了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和对党领导的革命的群众运动、对大跃进形势下必然产生的人民公社的对立态度。当然，这样一小撮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叫嚷，是无法抹煞在党的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在五亿多鼓足干劲的我国农民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創造的業績，更无法阻挡正在满怀信心、干劲冲天地奔向自己的美好前景的全体公社社員的前进的道路。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六日

省高教局和省社联筹委会

将組織科学工作者下乡参观訪問

广东省高等教育局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筹委会今后将有計劃地組織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分批下乡下厂参观調查，并决定于今年12月下旬組織第一批下乡参观訪問，目的是配合总路綫的学习，使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更好地联系实际，更好地了解当前农村大跃进形势和人民公社优越性；同时結合参观訪問进行有关人民公社若干專門問題的調查研究，以貫徹理論与实际相結合和科学为政治服务的方針。

第一批下乡人数暫定25人，分成三个小組。初步决定分別前往韶关市樟市人民公社、增城县石滩人民公社和花县花山人民公社。参观訪問時間暫定为一个月到一个半月。

坚决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杨奎章

“两条腿走路”方针保证国民经济 的高速度发展

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照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全程的灯塔。为了贯彻执行这条总路线，党中央和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根据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提出了一整套“同时并举”的方针，这就是：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同时，无论在什么经济部门和什么企业内，都实行集中领导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工作方法。

实行这样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不但是为了保持各个经济部门间的平衡，同时更为了最充分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贯彻群众路线，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组织到建设工作中来，保证多快好省要求的实现，保证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保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跃进。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建设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速度问题。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为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准备了条件。但是要把可能变成现实，还必须依靠人的主观努力。在同样的客观条件下，社会生产的发展可能慢些，也可能快些。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于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于人们对客观经济规律有正确的认识，从而制定出

正确的方针、路线、政策，正确安排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符合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健康地全面跃进。“两条腿走路”方针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早在我国开始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后不久，毛主席和党中央就指出既要抓工业，又要抓农业。1955年七月，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更明确地指出：“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毛主席还指出，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对于积累工业化资金，加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有着重要的作用。1956年四月，毛主席向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全面地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所遇到的重大问题，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工业和农业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的原则，提出了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的原则，从而在战略上解决了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问题。毛主席这一创造性的思想，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也得到反映。1958年五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党又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把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当作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作实现总路线的重要保证。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国人民以冲天的干劲，获得了伟大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两条腿走路”方针也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备起来。

这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运用马

克思主义辯証法的光輝范例。因为社会主义經濟是一个統一体，它包含着众多的对立面。工业和农业、工业中的重工业和輕工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都是对立的統一。实行“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針，“就可以在經濟建設的跃进中避免各种片面性，例如：只重視工业而忽視农业，只重視重工业而忽視輕工业，只重視大型企业而忽視中小型企业，只重視中央对工业的統一管理而忽視地方发展工业的积极性，只重視洋法生产而忽視土法生产，等等。这就是說，我們党的总路綫正是要求在高速发展国民經济的时候，把客观可能性和主观能动性統一起来，注意各种比例关系，遵从客观經濟規律。”^① 正确执行党的总路綫和“两条腿走路”方針，就可以保証国民經济不会发生长时期的、全局性的比例失調现象，就可以保証国民經济既是高速度又是按比例的发展。

以下，我們先就几个“并举”对我国国民經济建設的速度问题的关系，作一些簡要的分析說明。

首先，关于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則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輕工业同时并举。

在社会主义建設中，必須保証重工业的优先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再生产的理論告訴我們，要实现社会的扩大再生产，必須使生产資料生产优先增长，特別是要使生产生产資料的重工业部門优先发展。而高速度地进行社会主义經濟建設，也就是高速度地实现扩大再生产，因此，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原則，是不能动搖的。但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必須同时注意迅速发展农业，正确地处理工农业之間的关系，才能使工业建設得到順利发展。有人認為，社会主义建設的基本问题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其核心又是建立冶炼工业和机械制造工业，因此只要集中一切力量尽速发展冶炼工业和机械制造

工业就行了，对农业和輕工业的发展不予重視。如果这样孤立地发展重工业，表面看来好象速度快些，但是由于受到农业和輕工业发展速度的制約，整个国民經济的发展速度还是不可能很快的。相反地，实行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原則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輕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針，“农业和輕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資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② 事实正是这样，在第一个五年計劃中，我国工业在1953年和1956年都有較大的增长（1953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一一点七，1956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一），这和1952年和1955年农业的丰收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我国的輕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絕大部分是由农业供应的，农业大发展，輕工业也就有可能和有必要大发展，同时也大大促进了重工业的发展。1958年的大跃进，首先是由1957年冬全国掀起农田水利建設的高潮，农业生产一馬当先，推动工业的跃进，工业的跃进又反过来支持和推动农业的跃进，带动整个国民經济的大跃进。在工业生产中，我們实行“以鋼为綱，全面跃进”的方針，在鋼帅跃进的带动下，一馬当先，万馬奔騰，直接带动了許多基本工业如煤炭工业、机械工业、电力工业、基本化学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材料工业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輕工业的发展。这样，我国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不論在城市或者在农村，在重工业部門或者在輕工业部門，都出现一种共同跃进的局，实现了国民經济的高速度发展，今年又在去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繼續跃进。这說明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則下，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使工农业相互推动，就能

^①刘少奇：“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②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37頁。

有效地促进国民经济高速度地发展。

其次，关于大中小企业并举、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并举。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大工业，用现代技术装备来改造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其他国民经济部门，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和要求。但是，究竟是孤立地去搞现代化的大工业建设快一些呢？还是既搞现代化的大企业，同时又搞中小型企业，使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一齐上马快一些呢？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经验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的經驗，证明了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更能保证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既能集中主要力量建立现代化的大企业，又能充分发挥现有中小企业的生产潜力，使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一齐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同时，企业规模的大中小之间、生产方法的洋土之间，也只是相对而言，它们是会发展、变化的。在同时并举、共同跃进中，中小企业不仅支持了大企业，本身也将在发展生产中逐步扩大，由小企业变为中企业，由中企业变为大企业，由土法生产逐步过渡到洋法生产。例如去年我国大搞钢铁工业的“小土群”，仅仅一年，现在就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向“小洋群”的过渡。“这样一支象雨后春笋一般成长起来的生力军，在完成今年的钢铁生产计划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中小型高炉担负着全国半数的生铁生产任务，中小型转炉担负着全国四分之一左右的炼钢生产任务，中小型矿山担负着全国一半左右的采矿任务。”（1959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可见，实行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显然只会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而不会减低这种速度。

再次，关于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

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实行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

这对我们拥有六亿多人口、经济发展又极不平衡的大国来说，特别有着现实的意义。我们要进行高度计划性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全国的集中领导，全面规划是不可想象的。高度的计划性和统一性，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和要求。但是，如果只有中央集权，没有适当的地方分权，就不利于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也就不利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实行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就既有利于中央工业发挥骨干和领导作用，又有利于发挥各省、市、自治区、专区、县直到人民公社办工业的积极性。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发展工业生产既然是全国人民的普遍需要，这就必须执行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的方针，彻底打破那种认为工业只能由少数人包办的神秘观点。只有中央和地方各级直至合作社一齐动手，并且在大中小企业方面实行分工合作，‘众人拾柴火焰高’，事情才能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右倾机会主义者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攻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说什么全民办工业、全民炼钢铁“得不偿失”，其结果“只能多快，不能好省”。他们根本不懂得算经济账和算政治账。他们抓住工作中的个别的、暂时的缺点，不加分析，任意夸大，说成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从而否定“两条腿走路”方针和大跃进的正确和胜利，否定党的总路线的正确和胜利。上述的事实不仅彻底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各种谬论。而且有力地证明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两条腿走路”方针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在我国条件下的具体化

“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不但体现了我国六亿多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愿望，同时也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在我国条件下的

具体化，我們知道，国民經济有計劃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基本要求，是在生产資料和消費資料的生产之間，工业和农业之間，国民經济各部門、各地区之間，积累和消費之間都有适当的比例关系，以保証国民經济的平衡和协调地发展。实行“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針，正是完全合乎这一客观經济规律的要求，也是这一客观經济规律的創造性的运用。

首先，实行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輕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針，正确解决了国民經济中最主要的比例关系，即生产資料生产和消費資料生产两大部类間的比例关系。馬克思主义关于再生产的原理认为，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必須有一定的比例，才能順利实现社会再生产，而生产資料生产的优先发展，又是保証社会进行不断扩大再生产，保証国民經济高速度发展的必要条件。列宁指出，馬克思关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比例关系的公式，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我們知道，重工业主要是第一部类，农业和輕工业則主要是第二部类。这样，实行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輕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針，就能既保証了生产資料生产的优先发展，又保証了第一部类的生产与第二部类的生产能够有适当的比例，互相配合。

其次，实行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針，有利于解决各部門、各地区之間国民經济发展的平衡問題。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国民經济有計劃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要求全国通盘地有計劃地配置工业，更充分地利用自然資源，調整和消灭各部門、各地区之間經济发展的不平衡，逐步消灭城市和乡村間的差别。如果只是集中地搞中央工业，不搞地方工业；只搞大型企业，不重視中小型企业；只重視洋法生产，排斥土法生产，那就沒有充分反

映国民經济有計劃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不利于全国工业的通盘布局，不利于充分利用自然資源，不利于消灭各部門、地区間經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城乡間的差别。在1958年大跃进中，由于坚决貫徹执行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針，在全国范围内，包括众多的中小城镇和农村的人民公社，都兴办了大量的中小型工业单位，这对改变各部門、各地区間經济发展的不平衡，有着重大的影响。以鋼鉄工业來說，除了扩大原有的十八个鋼鉄基地之外，还新建了二十多个中型的鋼鉄基地和三百多个炼鉄基点。现在，除西藏以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能生产鋼了。而在一年以前，全国还有十个省区連一吨鋼都沒有生产过。现在，絕大多数省、自治区都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以鋼鉄、机械制造为中心的工业体系，为进一步确立全国完整的生产配置准备了有利条件。农村人民公社兴办工业，更展现出我国工业星罗棋布的壮丽远景，为逐步地消灭城乡差别开辟了道路。

此外，实行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型企业 and 中小型企业、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同时并举，还有利于迅速地滿足經济建設和人民生活的不同需要；有利于充分利用資源和物資，發揮生产潜力和节省建設資金；有利于培养工业生产队伍，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在滿足經济建設和人民生活的不同需要方面，大企业在滿足某些主要生产和消費需要方面虽然担負着重大責任，但在花式、品种、规格等方面，特别是在生活消費品方面，往往不及中小型企业。大企业虽是大量生产，但大企业数量少，产量还不能滿足需要，中小企业生产规模虽然較小，但数量大，集腋成裘，产量也就不少；重視中小企业的生产，也有利于減輕市場需要对大型企业的压力，使大型企业能更好地起着国民經济的骨干作用。在利用資源和物資，發揮生产潜力和节省建設資金方面，洋法生产的大企业投資大，時間长，設備复杂，技术要

求高，光靠这条腿走路，就很难做到又多又快；用土法生产或土洋结合的中小型企业投资小，收效快，设备简单，技术要求不高，可以多建快建。中小型企业还可以和大型企业协作，为大型企业加工制造零件部件，并充分利用大型企业的废料、次料、碎料，既使大型企业不必增添许多生产设备，又使原料和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此外，实行这样的几个同时并举，还可以把广大群众吸引到工业生产战线上来，壮大工人阶级队伍，壮大工业生产力量，提高技术水平。

“两条腿走路”方针是党的群众路线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具体运用

贯彻执行党的一系列“两条腿走路”方针的，同时，无论在什么经济部门和什么企业内，都实行集中领导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最充分地动员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开辟最广大的阵地，吸引最广大的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也就是说，在经济建设中走群众路线，从而保证社会主义事业多快好省地发展。

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党正是一贯坚持执行这一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从而取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接一个的胜利。那么，在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建设中，还要不要搞群众运动呢？在这个问题上，右倾机会主义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右倾机会主义者主张建设“正规化”、走“专家路线”，怕大搞群众运动会“乱”、会“得不偿失”。与此相反，“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继续把这种工作方法有系统地运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从而形成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展开了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局面。完全可以说，离开了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就不会有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

路线，也就不会有去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大跃进。”^①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实现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关键问题在于是否最广泛地发动了群众，最大限度地把各阶层的人民群众组织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来。“事实证明，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动员到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来，就能够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突飞猛进的局面。”^②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集中反映了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面貌的共同意志，对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觉悟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给予最大的重视。但是，要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动员到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来，首先就需要开辟足以容纳几亿人民的英勇劳动的广阔战线，使英雄有“用武之地”。实行党的一系列“两条腿走路”方针，就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使我们既能调动几千万职工的积极性，又能调动五亿多农民的积极性；既能调动重工业部门职工的积极性，又能调动轻工业部门职工的积极性；既能调动大型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又能调动中小型企业职工的积极性；既能调动技术水平比较高的职工的积极性，又能调动技术水平暂时还较低的职工的积极性。同时，在所有经济部门和所有企业中，又实行集中领导下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这就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直接和积极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实现。

我们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坚决贯彻执行“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所有经济部门和企业中坚持集中领导和大搞群众运动的工作方法，从而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高速度地跃进再跃进。

①周恩来：“伟大的十年”。

②刘少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欺騙性

张进潘擷馮訓瑜

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指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不过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这就是说他们虽然组织上已经入了党，但在思想上还没有入党。由于他们没有在革命斗争的熔炉里，接受党的改造，抛弃自己原有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所以，他们口头上虽然讲着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实际上却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表面上接受党的纲领，实际上他们从资产阶级世界观出发，搬出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来同党的纲领相对抗。

大家知道，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法国资产阶级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这个口号在特

定的历史条件下，它虽然吸引了工农群众，参加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具有反对封建主义的进步意义；但是，这个口号的实质，则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了保护 and 扩大资产阶级私有财产，也为了实现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享有绝对的统治权。因此，在它开始提出来的时候，就具有极大的欺騙

性。因为只要社会上还存在剥削制度、还存在着阶级对抗，那么，在剥削者阶级与被剥削者阶级之间，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平等。如果说，当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取得胜利，封建专制制度还没有垮台的时候，这个资产阶级的政治口号还能迷惑群众，那么，当资产阶级一经取得政权，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并在经济上、政治上取得了统治地位以后，“自由、平等、博爱”这个资产阶级政治口号的欺騙性就昭然若揭了。

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口号之一的所谓“自由”，实际上不外是要让资产阶级享有剥削雇佣劳动、进行商品交易、掠夺殖民地人民的充分自由；而对劳动者和殖民地的人民，则只有被剥削被掠夺的自由。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它不仅需要把生产资料和产品当作商品来自由买卖，而且要求劳动力也当作商品来自由买卖，以便在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中来榨取利润。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资产阶级政治，就要保证资产阶级享有这种剥削劳动人民的充分自由。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过资产阶级所谓“自由”的欺騙性：“资产阶级在凡是它已达到统治的地方，……它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条条的利害关系之外，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出什么别的联系了。它把高尚激发的宗教虔诚、义侠血性和俗人温情一概淹没在利己主义计较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身价变成了交换价值，它把无数特许和几经挣得的自由都用一个没心肝的贸易自由来代替了。总而言之，它用公开无耻直截残酷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①的确，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者可以把自己的劳动力“自由”地出卖给任何一个资本家，可是无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版，第11页。

产者却没有不出卖劳动力，不被资本家榨取剩余劳动的自由。因为在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的社会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不去给资本家卖命，就得活活饿死。列宁揭露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不过是骗人的鬼话时写道：“你们的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文明先生们，你们忘记了一件小事，忘记了你们的自由是写在把私有制法定下来的宪法上的。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①甚至一些天良未泯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对这块作为资产阶级无数罪恶行为的遮盖布的所谓“自由”，也不得不作这样的自供：“自由自由，多少人假尔之名而行恶！”。而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今天还拿这个沾满了资产阶级血污的所谓“自由”旗子，来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那就不仅是无知，而且是赤裸裸的暴露了他们的阶级立场了。

在阶级社会中，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平等”。不错，当资本家拿钱出来办工厂而获得利润，工人付出劳动而拿到工资，这件事看来是貌似“平等”的，资产阶级也是从来就认为这是“公平交易”。然而，工人能够拿回他的劳动所创造的全部价值吗？难道工人能够幻想自己与资本家同样享有不劳而获的“平等”吗？难道工人能够获得象资本家解雇工人那样，叫资本家离开他的工厂的“平等”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美国民间的一句谚语：“你偷一块钱，把你投入监牢，你偷一条铁路，选你为参议员。”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所谓平等的生动的写照。为什么这样呢？列宁的话道出了真理：“剥削者不能同被剥削者平等。……在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可能性没有完全消灭以前，决不能有真正的事实上的平等。”^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看来，平等这个概念，正如恩格斯所说：“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真实内容，都归结为废除阶级的要求。任何超越于这点之外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③

列宁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要争取的平等，就是消灭阶级”。事实上，在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从来没有给被压迫的工农群众以平等，当被压迫的工农群众经过革命斗争取得政权，成为国家的主人，而反动阶级成为革命专政的对象以后，在工农群众和反动阶级之间，也绝不会有平等。当着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深入发展，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要通过自己的革命政权，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彻底消灭阶级的时候，右倾机会主义者还拾起什么“不平等的旗帜”，那不过是代表不甘心灭亡的剥削阶级的一种绝望的叫嚣。

至于“博爱”这个概念，在阶级社会中，也是充塞着资产阶级的欺骗性。资产阶级除了金钱以外，从来就没有爱过什么东西和什么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言人总喜欢标榜他们的“人类博爱”、“天下一家”，他们认定资本家开办工厂是为了养活工人；他们扩充殖民地，输出大量资本，掠夺别个国家的资源，一直到以军备武装各国的反动派，扩展军事基地，是因为“同情落后民族”；而他们扩军备战，到处进行阴谋挑衅，却说是为了“拯救人类”，等等。而无产阶级当他自己处于被剥削、被压迫而饥寒交迫的时候，他除了热爱自己的阶级和本阶级的先锋队，热爱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外，是绝对不会空谈什么“博爱”的。

问题正如陈伯达同志所指出：“资产阶级所谓自由，实质上不过是要求有剥削雇佣劳动的自由，有做买卖的自由，有掠夺殖民地的自由；而在另一方面来说，就是劳动者

^①“列宁全集”第29卷，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19页。

^②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4页。

^③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9—110页。

只有被剝削的自由，就是殖民地人民只有被掠奪的自由。資產階級的所謂平等，在實質上，不過是要求買賣的平等，要求他們有剝削僱傭勞動的平等；而對勞動人民來說，他們只有在被剝削這一點上是平等的。資產階級的所謂博愛，在實質上，不過是要求把他們的剝削的觸角能夠無限地伸張到一切他們可能達到的地方，要求盡量地擴大他們的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而對於被剝削被壓迫的勞動人民來說，則是要求他們向資產階級的剝削感恩戴德。”^①

由此可見，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所欣賞的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原來就是一面虛偽的、騙人的沾滿了資本主義吃人制度血污的破爛的旗幟。今天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仍然抓住這些口號不放，用這些口號來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社會主義。這樣，他們實際上成了資產階級反社會主義思潮的代表，成為農村中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代表。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的問題。無產階級要实现解放全人類，建立沒有階級、沒有剝削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歷史使命，首先就必須通過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為核心的工人階級，領導勞動群眾進行這種形式或那種形式的無產階級革命，建立這種形式或那種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②這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普遍規律之一。因此，馬克思主義者從來就把黨的綱領集中到根本的一點，即集中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而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又必須通過共產黨的領導才能實現。誰要是不承認這一真理，不堅持這一真理，誰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我們黨內有些右傾機會主義者，恰好就在這一問題上暴露了他們的資產階級革命家的面目，他們對“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那樣的欣賞，

那樣的戀戀不舍；他們攻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認為“在人民內部不應該輕易談階級鬥爭”，指責“黨對階級鬥爭有過分的理解”，實際上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要求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平權”，要求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平起平坐地實行“階級合作”，要無產階級政黨屈從於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從而削弱黨的領導，削弱無產階級專政，為資本主義復辟開辟道路。

大家知道，今天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經濟已經占有絕對統治地位，資產階級想要用他們的經濟力量為武器來反對無產階級，直接從經濟上復辟資本主義，已經是不可能了。今後他們主要地是利用他們的政治影響和思想影響來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相對抗，從無產階級隊伍內部來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當着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一日千里地發展，加速了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最後滅亡和根絕產生剝削制度的根源的時刻，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拾起了陳腐的資產階級“自由、平等”觀來反對社會主義，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上就是那些一直留戀着“自由企業”“自由經營”的資產階級分子的要求的反映，也是農村一部分富裕中農對過去那種可以僱工、可以做投機買賣無限留戀的反映。所有這些，正如列寧所說：“搬弄關於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籠統詞句，實際上等於盲目地背誦那些反映着商品生產關係的概念。用這些籠統詞句來解決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任務，就無異完完全全轉到資產階級的理論和原則上去。”^③

①陳伯達：“紅旗”雜誌，1959年第22期，第13—14頁。

②“莫斯科會議的宣言”人民日報出版第9頁。

③“列寧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96頁。

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之所以对资产阶级的观念这么欣赏，对正在死亡中的阶级这么有感情，而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又那么不满，归根结底，是由于他们一直坚持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右傾机会主义分子顽强地坚持着这种世界观，死抱资产阶级的偏见，他们就必然一切以“我”为中心，唯我独尊，凡是符合他们自己的私利和愿望的，他们就承认它、赞成它；凡是不符合他们私利和愿望的，他们就否定它、反对它。他们就是以其阶级利害关系和个人的好恶来判断客观事物的好坏。我们要加强党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他们就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政治挂帅，高唱“自由、平等、博爱”的反调；我们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大搞群众运动，并把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以便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首创精神，高速度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们却说什么“政权到了手，革命到了头”，叫嚣“太紧张了，弦快断了”，并把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样的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攻击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总之，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好得很的事物，特别是新生事物，他们却认为这也不好，那也不对，并把这些事物说成是“糟得

很”。而在方法上，他们总是玩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一心要在我们高歌猛进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吹毛求疵，并且以点代面，把一些暂时的局部的缺点夸大起来，否定全盘。他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老是只看到事物的现象，看不到事物的本质，把我们前进中的暂时困难看成是永恒的、不可克服的。

这一切清楚地表明，当前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剧烈的斗争的继续。我们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把这次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得彻底，直到他们自觉地丢掉这一血污的旗帜，回到无产阶级的立场，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荣旗帜之下。那些受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反社会主义思潮所影响，存在右倾思想或右倾情绪的人，必须通过这一场斗争，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同过去遗留下来的诸如“自由、平等、博爱”之类的资产阶级的种种反动观念进行最彻底的决裂，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清除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世界观，坚决做无产阶级革命派。

华南师范学院将举行第三次科学讨论会

华南师院决定于1960年一月举行第三次科学讨论会，检阅1959年科学研究成果并总结经验；进一步贯彻党的总路线和学术研究方针，活跃学术风气。目前该院已成立主持科学报告讨论会的领导机构，并积极开展筹备工作；各系经过了充分酝酿，已提出了报告讨论的项目九十多个。其中历史系提出了“苏联共产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等十一项；中文系提出“中国文艺学的发展及批判”、“十月革命对中国文学的伟大影响”等十二项。所有提出报告讨论的项目有的已经完成，有的正在进行修改补充。

坚决挖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张涛 谢炳生

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深刻的革命。在它以前的一切革命，都是用一种新的剥削方式代替旧的剥削方式。以一些剥削者的政权代替另一些剥削者的政权，而社会主义革命，则不仅要改变旧的生产关系、摧毁剥削者的政权，而且要彻底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建立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新社会；不仅要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灭阶级，而且要和过去遗留下来的，反映旧制度的各种思想、观点、传统和习惯等作最彻底的决裂，在上层建筑的一切领域中清除剥削阶级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影响。因此，不仅要在经济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还必须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所有制方面的“谁战胜谁”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首先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的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还是很激烈的。而与两种对立的世界观有着密切联系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与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斗争，也就必然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日益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愈益深入，而越来越突出了。因为，一方面，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曾经用来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武器——以资本主义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済力量，已经失掉了，资产阶级企图在经济战线上战胜我们、复辟资本主义已经不可能了；此后资产阶级更多地和更主要地

是利用他们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来同我们进行斗争，从内部来逼迫我们放慢建设的速度，影响党的政策向右转，拉我们向后退，妄图达到他们为资本主义复辟打开道路的目的。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飞跃发展，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的新生事物正蓬勃地成长壮大，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必将愈益受到排斥限制，并一天天走向消灭。因此，资产阶级必然要用各种办法来反抗。总之，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上还没有灭亡，只要阶级还没有完全消灭，只要资产阶级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影响还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就依然存在。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这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深入。这是一场保卫总路线、保卫社会主义事业的严肃斗争，也是革命队伍内部一次深刻的思想革命，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必须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既然这场斗争归根到底是两个世界观的斗争，当然也就自始至终地贯穿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与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斗争。

大家知道，资产阶级世界观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而主观唯心主义根本标志，就是唯我主义。唯我主义者把一切客观事物当作是“我”的感觉的反映；没有“我”就没有世界、没有社会、没有一切。他们在对待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也就必然是以“我”为中心的极端的个人主义。

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尽管有各种各样的

表现，但其本质都不外是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损人利己。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最根本的东西。“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资产阶级的天经地义。因此顽强地保存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对待一切事物总是从是否对个人有利出发来考虑问题。他们关心的只是个人利益；他们判断一切事物的好或坏、正确或错误的唯一标准，也是从个人私利出发的，凡是符合他们个人私利的就是“真理”，他们就赞成；凡是不符合他们个人私利的就是错误，他们就反对。甚至可以颠倒是非，歪曲事实，变好为坏，变正确为错误，以符合他们的个人私利。所以，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飞跃发展，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思想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之间就特别显得不可调和了。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到处碰钉和倒霉的机会，也就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迅速发展而越来越多了。

在民主革命时期，有不少人原来是抱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带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参加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来的。当时，由于革命的主要任务和他们的个人利益在某些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他们有一定程度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积极性，因而还能够根据资产阶级革命家的需要，部分地同意党的最低纲领，从而在党的领导下，也还可以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其中，大部分人在党的教导下，经过长期革命运动的锻炼，逐步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和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已经改造或基本改造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有部分人一直未接受改造，他们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原封未动，个人主义十分浓厚；因此，他们虽然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这种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有的时候是潜伏着的，只在一些个别的日常的小问题上暴露出来，有的时候就发展起来，系统地暴露在对党内的各种原则问题上、重大的治政问题上和党

内斗争中。从这里，我们看到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与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坚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如果不彻底改造，任其发展滋长，到了革命转折关头，或阶级斗争处于尖锐剧烈的时机，政治上势必动摇，甚至从革命内部来反对党的领导和革命群众运动，反对党的政治纲领和路线方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正是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要彻底地粉碎右倾机会主义，就必须同时挖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连根拔掉。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总是历史唯心主义者，他们总是把个人能力估计得天那么高，夸大个人的作用，把个人看成是“救世主”。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历史是少数英雄豪杰所创造的，而人民群众却不过是“阿斗”、是“群氓”。因此他们从来就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他们反对劳动群众用自己双手创造新的幸福的生活，反对在建设中大搞群众运动。在革命和建设的问题上，他们极力压制群众的智慧和革命首创精神，总是害怕群众搞得“过火”，企图把人民群众的革命活动，限死在一定范围之内，实际上就是反对群众运动。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中有些人就曾经对“其势如暴风骤雨的”农民运动惊惶失措，大叫“糟得很”，他们经常对革命群众运动泼冷水，挫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现在，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特别是象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运动这样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就更加惊惶失措，以致不惜进行种种恶毒的攻击和污蔑。可是，反对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运动，就必然是阻碍和限制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和革命首创精神的充分发挥，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高速度发展。因此，反对革命群众运动，实际上也就是反

对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又是加强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团结的最凶恶的敌人。誰都知道，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团结是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的根本保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党内和革命队伍内的存在和发展，就会削弱党的领导，分裂党的团结。从这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所揭露的事实证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他们不是把自己看成党和人民的驯服的工具，而是把党和人民群众当作达到个人的目的和野心的工具；他们不是大公无私，老老实实地工作，当一个忠实的人民勤务员，而是把党的工作，作为个人沽名钓誉，争权夺利的手段；工作有了一点成绩便居功自傲，伸手向党、向人民要名誉、要地位、要待遇，党没有满足他们时，就埋怨不满；当工作中出现缺点，就不负责任，把责任推给别人，播弄是非，用以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自命一贯正确，夸大个人的作用，反对政治挂帅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把自己领导的地区或部门看成独立王国，个人专断独行，闹不团结；他们对上要民主，对下则要集中；他们毫无组织原则，只有个人主义的原则，对上级的指示和决议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合意则执行，不合意则拒不执行，或者阳奉阴违。对干部的使用则封官许愿，拉拉扯扯，排挤打击，进行派别活动。在处理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时，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只顾局部，不顾整体。这些人不是和党一条心，而是和党两条心。当党还能暂时满足他们的个人欲望时，他们就同党“合作”，否则，他们就起来反对党，散布流言蜚语，挑拨离间，破坏党的领导威信，分裂党的团结。因此，只有彻底挖掉丑恶的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才能维护、巩固、加强党的团结和党的领导。

抱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他们好逸恶劳，贪图享受，怕艰苦，怕紧张。他们关心

的只是个人的眼前利益，只看到自己鼻尖下的事情。他们没有革命的理想，没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志愿和热情，没有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艰苦奋斗的精神准备，革命意志衰退，不愿做艰苦的工作，斤斤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工作要少，待遇要多。今年经济生活中出现某些暂时的局部的供应紧张，他们少吃二两猪肉，少用一块肥皂的时候，便表现极端不满，抹杀大跃进的伟大成就，到处叫喊：“全面紧张”“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把大跃进说成是“大跃进”，消极怠工。

当前党内的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个人主义野心家，恶毒地攻击党的领导，非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企图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绝不是偶然的。这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映，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对抗，也是这些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发展的结果。

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如果任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党和革命队伍内部滋长和泛滥，势必严重危害腐蚀我们的党和革命的队伍；如果不坚决地、彻底地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不可能贯彻，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不可能高速前进。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产阶级党性是根本对立的，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行为绝不可以采取调和和容忍的态度。因此，对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态度问题，就成为考验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是否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能否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一个根本立场问题。只有经常不断地反对和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加强自我改造，才能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和确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才能够经常保持蓬勃的朝气和坚强的革命意志，自觉地站在党的立场，坚决保卫和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胜利地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广州市场的回顾和展望

陈克

今年以来，广州市同全国一样，政經济形势无限好，生产继续大跃进的浪潮滚滚向前，市场呈现一片兴旺繁荣。可是，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妄想利用市场上在一个短時間內出现少数商品供应紧张的困难，抓住我們商业工作上某些暂时性的缺点，尽其誹謗之能事，到处兴风作浪，对总路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进行大肆攻击。他們說：

“大跃进，越跃越糟，国民經济比例关系失調，造成市场全面紧张”，“人民公社搞糟了，造成副食品供应紧张”，“广州市场最糟”，等等，不一而足。可敬的先生們！別作梦了，我們共产党人是懂得阶级分析的，对市场紧张的看法同你們有着根本的分歧。俗語說：“大話怕算賬”，鉄的事实再一次粉碎了这些恶毒的謬論；一些受了这股妖风邪气冲得发晕的人也开始清醒过来了。我們共产党人、广大革命群众坚持总路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意志是动摇不了的。

(一)

我們知道，市场形势好坏的主要标志是：社会商品零售額的消长、商品庫存的增減和物价的稳定与否。因为社会商品零售額是标志着居民在一定時間內，为了个人的消費而购买的商品总量，它的消长是能够反映出市场是活跃还是呆滯。商品庫存的增減，則是生产是否发展的很好說明。如果社会商品零售額增长了，而商品庫存却减少了，这就說明生产并没有相应地增加，甚至可能是减产；如果社会商品零售額没有增长，而商

品庫存却增加很多，这就說明商品銷售有困难，市场呆滯。在物价稳定的情况下，社会商品零售額和商品庫存都增加，这就說明市场形势良好，市场兴旺繁荣，并且真实地反映了生产大跃进的雄伟步伐和人民經济生活的日益美好。

今年以来，广州市场形势怎样呢？根据上述三个主要标志来衡量，广州市场形势同全国一样：好得很。首先是社会商品零售額增长很快。据統計，今年1—10月份全市社会商品零售額比去年同期增长13.21%，这个增长幅度，大大超过了1958年比1957年增长7.08%的幅度。虽然上半年有一段时间曾經有过少数副食品和个别小商品暂时供应不足，但是，許多商品的供应数量还是增长很大。在二十四种主要副食品中，今年1—10月的供应量比去年同期增加的有咸魚、海味、水果、蔬菜、食糖、罐頭、烟酒等十六种，其中蔬菜增加55%，塘魚增加70%，水果增加46%，罐頭更增加达六倍多；生猪在10月的供应量也比9月份增长58.9%。日用工业品的供应量也有显著的增加，以今年1—9月份同去年同期相比，毛巾、棉布、卫生衫褲等都增长51—77%左右，棉毛衫褲、胶鞋等更增长达一点二至一点八倍以上；10月份以来，各种百貨用品的供应量又有更大的增长，特别是冬令商品，仅以11月上旬与上月同期相比，卫生衫褲增长63.6%，棉毛衫褲增长44.3%，毛綫、毛綫衣等也增长13—14%。目前，各种冬令商品已全部应市，曾經一度感到供不应求的小商品和一些副食品都已經逐步增加，全市大小零售商店

都是貨物滿架，顧客盈門，到處都是“繁花似錦客如雲”，一片暢旺活躍。在社會商品零售額迅速上升的同時，商品庫存也顯著增加。今年10月底，全市商業部門的工業品和農副產品的商品庫存不但比去年同期增加60.43%，而且大大超過了去年底的庫存水平。如市百貨公司在11月中旬的商品庫存比去年底即增加52%；文化用品公司比去年同期更增加93.48%。在副食品方面的生豬、菜牛、雞、鵝、鴨、塘魚、咸魚、海味等十種商品，在10月底的庫存比去年同期都增加一倍以上。由於商品庫存雄厚，市場就日益健壯繁榮，物價穩定。在同人民經濟生活有密切關係的二百零二種商品中，今年以來，除了個別商品品種（如一些季節性的蔬菜）的價格稍有上升以外，其他絕大部分都保持在去年的水平；在海味、百貨、醫藥等商品中，有部分品種的價格水平還比去年有所下降。這樣就使人民經濟生活十分安定，而且越來越好。

從上面的事實可以看出，廣州市場是健壯興旺、活躍繁榮的，這是市場問題的本質和主流，是誰也抹煞不了的客觀存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說什麼“市場全面緊張”的謬論不攻自破了。

當然，我們說廣州市場興旺繁榮，並不是說一點問題也沒有發生過，或者現在什麼缺點也沒有了。有的。我們並不諱言，在今年上半年曾經有一段時間，市場上確實有過少數商品供應比較緊張。這些商品主要是肉類、蛋品、家禽等小部分副食品 and 少數小宗日用工業品、手工業小商品，特別是六月中旬遭受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侵襲期間，一些副食品如蔬菜、豬肉等更感不足。但是，從總的看來，屬於穿的和多數用的以及一部分副食品，供應並不緊張，而且許多商品的銷售量還增長很大。兩者相比，顯然，這只是十個指頭中的一個指頭，是暫時的、局部的問題。而且對於這個問題，黨和政府又及早

採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特別是黨中央六月間在上海舉行大中城市副食品 and 手工業生產會議以後，本市的日用工業品、手工業小商品以及副食品的生產，都有了很大發展。商業工作上的一些缺點也有了顯著的改進，在全市範圍內先後增設了四千多個營業點，還有四百多間商店擴大了業務範圍；商業人員也增加了一萬三千多人；各種修補業務和街道服務業又有了很大發展，大大方便了人民生活的需要。由於中共廣東省委、廣州市委加強對市場工作的領導，以及商業職工的努力，特大洪水帶來市場供應工作的困難迅速消除了，市場供應情況迅速好轉。7月16日起，豬肉供應已經恢復水災前的水平，塘魚、蔬菜、家禽等副食品的供應量都開始逐步增加，早點、夜市的供應量也由年初的一百多種增加到二百多種，水果、雪條、汽水、糖果、餅乾以及各種日用百貨、手工業小商品的上市量都有很大的增加。儘管目前有些商品的供應還不十分充裕，而隨着生產的迅速發展，商品貨源必然是越來越多，市場必然是日益活躍繁榮的。但是，對這些事實，右傾機會主義先生們是不感興趣的，他們總是死死抓住我們已經克服了的或者正在克服的一些暫時的、局部的缺點，大做文章。然而，任何歪曲誹謗、造謠煽惑，說什麼“廣州市場最糟”，都是枉費心機的。

（二）

既然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所謂“市場全面緊張”的謬論不攻自破，那末，說“市場全面緊張”是“國民經濟比例關係失調”、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搞糟了”所造成的論調，更是無稽之談了。誰都知道，1958年是工農業生產空前大躍進的一年。這一年，廣州市工業總產值比1957年增長66%，比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全市工業產值的總和還要多32.16%，而且大大超過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期

間平均每年递增24%的速度；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也增长22%，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間平均每年递增5.3%的速度快得多。其他方面如基本建設、交通運輸、商业等也同时大跃进。今年，在去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又继续大跃进，特别是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全市范围内迅速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反右倾、鼓干劲的增产节约运动新高潮，使生产一跃再跃，捷报频传。1至11月底止，全市工业总产值比大跃进的1958年全年总产值还要多26.7%。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消费资料生产也高速度发展。纺织工业、轻工业都在11月下旬先后提前完成了全年的产值计划。纺织工业的产值，到11月24日止就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产值的12.03%；轻工业也有很大跃进，新的产品和新的品种大大增加。手工业小商品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很快，经过四个月来的努力，去年曾经一度停产的二百五十六种手工业小商品，到10月底止已经恢复生产的有二百五十三种，占停产产品的98.7%，而且绝大多数产品的产量、质量都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去年8月前的水平。郊区自贯彻执行“蔬菜为纲、全面发展”的农业生产方针和“公养私养并举”等畜牧业生产方针以来，蔬菜的种植面积已从原来六万亩逐步扩大到现在的二十多万亩，蔬菜总产量大大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使广州市的蔬菜由原来只能自给60%转为完全自给。在搞好蔬菜生产的同时，粮食生产取得特大丰收，晚稻平均亩产五百斤，比去年增产20%。畜牧业等多种经营也得到很大发展，以9月底与去年底相比，全郊区生猪饲养量增加49%，家禽增加二点六倍，塘鱼的养殖数量，也有显著增加。市内的机关团体工厂企业以及人民解放军驻广州部队，自贯彻执行“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的城市副食品生产方针以后，成绩很大。到9月底止，生猪饲养在栏数比6月份增长61.4%，家禽在栏数比6月份增长88.7%；此外，街

道居民和职工家属饲养的家禽也不少。由于副食品生产的发展，从10月份起，许多单位在肉食供应方面已经能够做到经常自给了。同时，全国各地和省內各地经济战线上的各个方面也在继续大跃进，工农业生产的跃进捷报频传，到处欣欣向荣。

工农业生产继续大跃进，给市场提供了充沛的货源，本市商业部门收购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情况越来越好。今年1—10月止，市第一商业局在本市收购的工业品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52.96%。收购的手工业小商品也逐步增加，从8月份起，许多同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小商品，收购数量都已先后超过去年的最高水平；花色品种达一千多种，真是应有尽有。在郊区的农产品收购情况也很好，今年的秋粮收购计划已经超额完成；1—11月15日止，各种农副产品的收购总值也比去年同期增长41.3%，其中鸡、鹅、鸭增加71.79%，塘鱼、水果等也增加很多；生猪调进市区的数量，第三季度比第二季度增加38.89%。各地支援本市的副食品，也源源调运应市。

经济战线上的各个方面继续大跃进的大好形势，是市场兴旺繁荣的基本条件。因为生产是产品流通的基础，生产决定着流通和分配（当然，流通和分配反过来也对生产起一定作用），生产增长越快，为市场提供的商品货源就越多。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大跃进成就辉煌，人民公社化好得很，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也是协调的。在物价稳定的情况下，社会商品零售额迅速增长和商品库存充裕，也直接地反映了工农业产品的大量增加。大量的工农业产品从何而来？当然不是上帝的“恩赐”，或者是那一个魔术家的“法术”，而是广大工农群众在去年以来辛勤劳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可见，今年以来广州市场的兴旺繁荣，正是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实现继续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越来越显著的结果，它无可争辩地证

明：这是总路綫的光輝胜利！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伟大功績！

(三)

生产高速度地发展了，商品上市数量大大增加了，社会商品零售額迅速增长了，为什么有些商品供应仍然有些紧张呢？主要原因是生产增长的速度赶不上人民购买力增长的需要。人民购买力的巨大增长，一方面是由于去年工业生产、基本建設和各項事业都发展得很快，因而社会就业面迅速扩大，职工人数增加得比較多，这就使城市购买力增加得特別快。例如，广州市去年就增加就业人数达八万多人，职工工資总額比1957年增加13%，人民购买力也就跟着增加7.07%。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林、牧、副、漁得到全面发展，大批农村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加上实行了工資制与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等等，使社員的收入和公社的积累大大增加，农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农民购买力增长很快。根据广东省十个县十个点一百五十戶的調查，按人口平均生活費支出，1958年比1957年增长17.3%，其中，主食增长11.1%，副食增长15.4%，衣着增长65.7%，文化与生活服务費增长25.1%。广州市郊区也是一样，去年同前年相比，农民平均每戶純收入增加22.2%。一些副食品在农村的消費量大大增加了，所以在城市的供应就稍有减少，这是十分自然的。但是，消費水平一向比較低的农民，在生产大发展以后，在一个时期內自食自用多了一些，城里人口又有什么理由加以指責呢？至于广州市的猪肉、蔬菜等副食品的供应曾經一度减少，这是因为广州附近地区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不仅使生猪、蔬菜、家禽等貨源受到重大損失，而且非灾区的貨源，也因为交通阻塞而无法調运，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当然，除了以上原因以外，还由于部分地区安排生产上有些缺点，主要是抓得不够紧，在公社化初期，有的地区家庭畜牧业生产有些下降；同时，在去年大丰收的时候，有的地区粮食收割工作有些粗糙，在使用上也缺乏計劃，吃多了一些。有的地区一些手工业小商品也停产了一些。但是，这些都是暫时的、局部的现象，而且很快就克服了。其实这些暫时的、局部的紧张情况，不仅今天有，今后仍然会有的。因为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建設的高速度发展，工矿职工和城市人口将会大大增加，人民购买力将不断提高；同时，为了爭取建設的高速度，我們必須首先滿足原料材料工业生产和重工业生产的需要。这样，尽管商品供应不断增加和市场供应不断改善，在供求关系上暫时的、局部的紧张，还是难免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而且还应当認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供求关系，总的来說，基本上是适应的，而在一定时期又存在着某些个别商品供不应求的矛盾。既然高速度地建設社会主义是六亿多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迫切要求，既然要高速度地建設社会主义，就难免会出现个别商品的暂时供不应求的现象，那末，对广大的劳动人民来說，只要把問題的实质說清楚，他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右傾机会主义先生們对广州已經由消費城市变成社会主义工业生产城市这一翻天覆地的事实閉口不談，对广州市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問題已經根本解决这一万民传頌的事实閉目不看，对人民生活的日益改善这一人人叫好的事实充耳不聞，而对一些已經克服了缺点却很感兴趣，念念不忘，恶毒誹謗。这些人居心何在，不是十分明显的嗎？

右傾机会主义分子那么留恋解放前的广州市场，但是，只要大家稍为回忆对比，就可以知道，解放前的国民党反动派統治时代和軍閥陈济棠統治时代，是一个“朱門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那个时候的市

场，在商店里尽管也陈列着很多商品，这但与广大劳动人民有什么緣份呢？还不是供給为数极少的軍閥、官僚、地主、买办、資本家們享受！而用自己的劳动生产出这些产品的广大劳动人民却掙扎在飢寒交迫的死亡綫上！在那个时候的市场，尽管表面上也很“熱鬧”、“繁荣”，但它正象在垂死的人的脸上涂滿脂粉一样，又怎能掩盖其蒼白、憔悴的本色——洋貨充斥市场，港币泛滥成灾，地下錢庄和“剃刀門楣”到处兴风作浪，金融波动，物价一日数涨……！这就是可敬的先生們所留恋的世界。解放以后，广大工农群众摆脱了終日劳累、不得温飽的苦难日子，生活逐步改善了，特别是去年以来，生产建設和各項事业的发展很快，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所以有些商品供应出现一些紧张，这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这种紧张，我們共产党人、革命群众認为，这是前进道路上的紧张，是市场兴旺繁荣中的紧张，是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中的紧张，同时又是已經克服或者正在克服的紧张。試問：这有什么

不好？如果右傾机会主义先生硬要拿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同解放前来比，这些紧张也确实解放前所沒有过的。因为解放前的那些紧张，是占人口90%以上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飢寒交迫的紧张，是掙扎在死亡綫上的紧张。試問：这又好在那里？在事实面前，說“现在比不上解放前”的人，原形毕露了。

面对着当前市场的大好形势和越来越美好的前景，广大人民群众都充滿信心。随着生产建設的高速度发展，給市场提供的商品貨源必然是越来越多，在人民购买力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人民經濟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必将越来越多地得到滿足。尽管还可能会有这种或者那种商品的供应还不能很充裕，甚至会有一些暫时的紧张，但是，市场形势仍然是而且肯定是比现在更加兴旺繁荣。

让可敬的右傾机会主义先生們狂吠吧！我們要更高地举起总路綫的紅旗，为广州市场的日益兴旺繁荣而热烈欢呼！

广东师范学院訂出1960年科学研究初步规划

广东师范学院师生在党的领导下，在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有计划地进行了科学研究的规划工作。现已初步訂出1960年的科学研究的跃进规划，爭取在今年跃进的基础上得到更大的跃进。

該院一年来的科学研究工作完成項目达900多項，质量較高的有269項。这些科学研究的成就，对于打破迷信、服克保守思想，反对唯条件論等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通过科学研究使全院师生更認識到党的教育方針的无比正确。在这次制訂科学研究规划过程中，因为貫徹了总路綫的思想教育，批判了科学研究为个人名利地位服务的資产階級思想，新老教师对党的科学研究工作方針都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这次訂出规划的特点，首先是貫徹了理論与实际相結合，科学研究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針；同时还明确地提出要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做法：理論研究与技术研究相結合、个人研究与集体研究相結合等。参加科学研究的人数也空前增多，据初步統計：該院各系各教研室教师除病弱外，已百分之百提出了研究項目，一些輔助人員都踊跃投身到科学研究工作中。

广东原始社会初探

中山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研组

一、

恩格斯說：“随着人的形成，我們就进入了历史的領域。”^① 广东地区的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于广东地区什么时候开始有人类。

一九五八年，广东曲江县馬坝人类头骨化石的发现，說明广东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二十至三十万年前。馬坝发现的人类头骨化石，在我国所发现的人类化石中，仅晚于中国猿人而比丁村人、河套人为早。根据它的性质研究，可以断定它属于猿人类型的晚期或古人类型的早期。同属于这一发展阶段的人类，以及同属于这一地质年代的考古証迹，在別的国家也发现过。根据恩格斯和列宁的論述，苏联原始社会史学者指出：猿人时代正处于原始群居公社阶段，古人时代已經进入逐渐形成上古氏族公社阶段。^② 因此，我們也有理由肯定，馬坝人正处于这两个阶段之間，那就是从原始群居公社开始向上古氏族公社过渡的时期。

到目前为止，在馬坝人的发现地点，还未发现过石器，这对于論断馬坝人时代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情况缺乏直接的証迹。发现馬坝人类头骨化石的地点是一条长约四十至五十米，宽約〇·六至一·五米，高約四至十米的狭长深沟里，而且沒有其他肢骨发现，已发现的山洞内部相当黑暗，目前还没有发现用火的痕迹。因此，现在发现馬坝人类头骨化石的地方，显然不可能是当时人类的居址。

馬坝地带分布着相对高度由二十至五十米的平緩台地上，还发现有古河流的冲积砾石层，台地的高度又可与溶洞的高度相对比。在馬坝人的时代，古馬坝河的河面比现在的河面还要高，有較宽广的冲积平地。馬坝附近当时还矗立着許多石灰岩的峰林和分布着許多崗巒。馬坝人生活在这个有水有山有平地又有岩洞的环境里，茂密的草木，成为他們采集野果和根块的对象。与馬坝人头骨化石一同发现的古动物群化石中，有凶猛的巨兽，如虎、剑齿象和巨獾等；这些巨兽曾威胁人的生存，人們必須和它們做不断的斗争。此外，还有比較容易猎取的动物，如野猪、羊科动物、鹿和鼠等，还有水栖的龟、蚌和蜆，这些都可能是馬坝人捕食的对象。从动物群化石的种属，可以知道当时的气候相当温暖，馬坝人获取的食物比較丰富，他們在这一带的大自然环境中集体劳动，成群地过着不定居的生活，用群的力量克服猛兽的威胁，繁衍着子孙后代，不断提高生产力，把社会和文化向前推进。

二、

按照一般石器时代的考古学年代，約一

^①恩格斯：“自然辯証法”导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七四頁，一九五五年，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②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綱”，第二七、二八頁，一九五五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阿·尼·格拉德舍夫斯基：“原始社会史”，第四〇頁，一九五八年，高等教育出版社。

万四千年至七千年前，人类进入了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初期，即原始氏族公社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当时由于劳动经验的积累，生产力已获得进一步发展，石器生产工具，在制作上虽然仍保持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特征，用敲击和压制的方法制成，但在器类上已经进一步复杂化并有了新的创造。其中如弓箭的初次出现即具有重大的意义。恩格斯说：“高级阶段（引者按：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相当于中石器时代）——是从弓矢底发明开始的，因为有了弓矢，猎物便成了日常的食物，而打猎也成了正常的劳动部门之一。弓、弦及矢，都已经是一种很复杂的武器了，这些武器底发明，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及敏锐的智力，因之，也要同时熟悉其他许多发明。”①

一九五八年，在广东南海县西樵山周围的坡积和冲积扇的地层中发现了大批石器，按其性质，一部分是新石器时代初期的工具；另一部分中的一种是明显地保存着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特征，而早于新石器时代初期的；还有一种是不属于旧、新石器类型的，这两种石器可能是属于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但是，由于还未举行系统的发掘，地层关系未明确，尚未能肯定确属什么时期，但按照已发现的石器的性质和用途以及古地理条件看来，广东可能有过中石器时代，我们就是根据这一线索，从而探测当时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为着下文叙述方便起见，且把可能早于新石器时代初期的遗物称为第一类型，新石器时代初期的遗物称为第二类型。

在第一类型遗物中，出现了箭镞。箭镞的制作还保持着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表明了它是最原始的形态。这个发现，证明了恩格斯对弓矢出现于中石器时代论断的完全正确。

此外，还出现了有各种形式和用途的刮削器、尖状器和刀锯器等。人们使用这些生产工具，表明当时曾过着狩猎生活。他们用

尖状器或用箭镞来猎取动物，用船底形刮削器和锥尖来制作兽皮衣服，用这些工具和刀锯器来制作骨器，其中制成的鱼叉则用来猎取水栖动物。虽然到目前为止，在西樵山附近还没有发现骨器，然而，属于这个时期的其他地方的文化遗址，都曾普遍出现过骨制鱼叉，它表明还继承着旧石器时代晚期马格特期以狩猎和渔猎的经济特征。不过，这时西樵人的经济生活比马格特期较为稳定，人们已经有了较长期的定居生活。恩格斯说：“如果把已知弓矢，但尚不知陶器术（摩尔根认为这是向野蛮时期过渡的开始）诸民族，彼此比较一下，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定居而成村落底若干萌芽，……”。②这是由于旧石器时代末期，全新世开始，气候温暖，到处长满了林木，葱郁的森林在这时成为人们生活极大的障碍。同时，处于冰期的马格特期所盛产的驯鹿在广大地区内已经绝迹，追逐驯鹿的生活因而失去了原来的经济意义。于是，人们开始移居到较为广阔平坦的水边、湖边或沼泽地带。人们过着长期的采集生活，观察到野生植物的生长和成熟的过程，从而发明了农耕。最初，农耕的规模很小，只适宜在卑湿的、肥沃的和没有复盖着森林的沼泽地带发展。因此，沼泽地带最先出现农耕是非常可能的。同时，弓箭发明以后，生产力显著地提高，生活资料有了进一步的保障，这就使得氏族公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氏族的集体更加巩固以及有可能较为长期地在水边、湖边和沼泽地带定居下来，因而给原始农业的出现提供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条件。农业的出现，是人类生产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开始给人们提供新的、经常的和易得的食物，这就促进了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二二页，一九五七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二二页，一九五七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人們定居的生活和社會的進一步發展。

根據對西樵山附近古地理的研究，這裡曾是一個淺水的沼澤地帶，約在三千年前開始形成現在的沖積平原。西樵山石器時代遺址的發現，又一次證明了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過渡期間的經濟發展規律。^①象西樵山附近這樣性質的遺址，如法國的阿齊爾、^②我國的札賚諾爾、^③和陝西朝邑大荔的沙苑^④等遺址的文化層或古地理條件都是卑濕沼澤地帶的河湖堆積。因此，中石器時代的人類選擇這些地形居住並不是偶然的。

通過西樵山第一類型遺物的發現，使我們知道當時的人們，大約在山麓一帶活動，他們過着以漁獵為主的經濟生活。在捕魚活動中，人們普遍地使用着細石器工具，而且開始使用着具有進步意義的捕魚工具弓——箭。同時人們還進行狩獵活動，因為弓箭和尖狀器也是狩獵的重要工具。除以上兩個生產部門以外，原始的沼地農業在這時也開始出現了。

在西樵山的文化遺物中，發現了第二類型石器（即新石器時代初期），這些石器，除在地面採集外，還在探掘中初步發現了它的文化層。在文化層里出土的遺物有大量的細石器石片和打琢制的石器，這些打琢制石器已經不再具有舊石器時代晚期的特徵，制法也粗糙。文化層中還出現了打琢制的象是雛形的雙肩石斧和打琢半磨光的大型雙肩石斧。此外，還共存着康辟利期型的長條形斧或石葉，以及紋飾單純的夾砂粗陶片。以上遺物，說明了銜接第一類型遺物的是新石器時代初期。長條形石斧和半磨光雙肩石斧的出現是與農業的進一步發展緊密地聯繫着的，也是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標志。因為這種斧出現以後，人們就能砍伐灌木叢，開墾荒地，使農業有條件從卑濕的沼地發展到更為有利的旱地上來。同時這種石斧還可以用來建築木頭房子。

恩格斯指出：野蠻時代的低級階段（引

者按：野蠻時代的低級階段相當於新石器時代初期）“是從陶器的應用開始的。”^⑤在世界各地的考古証迹中已經証實了恩格斯這一天才的論斷。陶器的出現與初期農業的發展有着密切的聯繫。因為農業發明以後，人類才能獲得進一步穩固的定居生活，才能適宜於使用陶器，而旱地農業出現後也需要陶罐子來從事灌溉。西樵山新石器時代初期文化層所出現的陶片，正是說明農業、定居和陶器的出現之間的相互聯繫的規律。考古學和民族學已經證明新石器時代初期的經濟特徵，主要是農業的進一步發展，但捕魚的狩獵仍不失為重要的生產部門。同時，也說明了當時的母權氏族社會正從發展期進入了繁榮期。

三、

大約在三、四千年前，廣東進入了新石器時代中晚期。解放後，幾乎遍及全省的普

^①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綱”，第七四、七五頁，一九五五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②阿齊爾遺址的地層分為九層，第四層為馬格特期文化層，第五層為沙土河流堆積層，第六層為阿齊爾期文化層，這一層是帶有大量紅色氧化鐵土層，表明當時氣候極端潮濕。見H.F.Osborn: *Me of the old stone Age*, P.461, 1927, London.

^③札賚諾爾遺址在內蒙古自治區的北部、呼倫湖。這裡的第四紀地層，大約都是河湖堆積。堆積的形成可能是由於呼倫湖的變遷。以前呼倫湖面積很大，以後逐漸縮小，成為現代的呼倫湖。因此它周圍都是第四紀的河湖堆積的。見安志敏：關於我國中石器時代的幾個遺址，考古通訊，一九五六年第二期。

^④這個地區從古代起便叫“沙苑”。它是一個相當大的沙丘地帶。在它的東部，特別是大荔縣境內，多沼澤和水草地區。見安志敏：陝西朝邑大荔沙苑地區的石器時代遺存，考古學報，一九五七年第三期。

^⑤恩格斯：家族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第二三頁。

查和重点发掘，給我們提供了說明这一时期社会面貌的丰富材料。

这一时期，即原始氏族社会的繁荣时期，捕鱼、狩猎和农业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手工业也出现了。人們按照生产部門发展的需要，分別选择自然条件适宜的地方定居下来。这一时期的遺址，大多分布在小河两旁和滨海的山崗或台地上，另一些則分布在河、海濱較高的地方。遺址分布很广，例如，广州市东郊飞鵝岭、龙眼洞、广州至从化公路沿綫以及潮阳县金溪水庫等处的遺址群，就密集在連綿几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可见当时村落的范围更加扩大了。

居住在山崗、台地上的人們，过着以农业为主的生活。磨光的石斧、石斨是当时主要的生产工具。人們使用这种工具，在适当的地段内将灌木丛砍倒、烧光，然后用一端被削成或烧成尖端的木棍来松土、播种。石鏟在这时也开始出现了。上面所叙述的这种农业生产方式，解放前本省某些少数民族地区仍旧保留着它的残余形式，亦即文献上記載的“刀耕火种”。

由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人們使用的生产工具也日趋多样和专门化了。除斧、斨外，遺址里还发现有凿、刀、鋸等等磨制非常鋒利的石制工具。带有双肩和有段的斧、斨的制作也进一步完善起来，外形一般都很工整，似乎也很鋒利，这是当时生产工具的一个重大的改革。由于这些工具的改进，就能使石器更牢固地装在木柄上。这样，不仅可以用它来砍伐林木，而且还可以用作鋤掘土地和对木材进一步进行加工了。

在山崗和台地的遺址里，还常常发现磨制箭鏃、戈、矛等石制武器，有一些遺址里还发现有石、陶制的网墜。可见，狩猎和捕鱼仍然是这里的居民們的重要生产部門。

那些选择在河、海濱較高地方居住的人們，主要是从事漁业生产。在这些遺址里，除发现一般的石器外，还有骨制的鏃、針和

多量的石、陶网墜，有些网墜是比較大型的。可见当时人們不仅使用弓箭漁猎，并且能够使用較大的魚网捕鱼了。此外，在这些地方居住的人們，有些在浅水地方凭借潮水的涨落捞捕小魚和介壳之类的食物，食余的介壳及其他杂物堆积在村落附近，因而在遺址范围之内往往看到象小丘的貝壳堆积。在这类貝丘遺址，也普遍发现了石斧、石斨，这表明当时人們除了从事捕鱼、狩猎外，也从事农业生产。

从上述各类遺址，可以知道当时人們主要是从事农业、捕鱼和狩猎三种生产活动。它們因自然条件不同而有主次之分。較多的地区，农业是生产活动的主要部門。在条件特別有利于漁业的地方，捕鱼則成为生产活动的主要部門。在当时生产力仍处于很低的条件下，人們需要充分利用各种手段来获取生活資料。因此，三个部門是互相結合起来的。一般地說来，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业和畜牧业都处在发展阶段上，畜牧业并逐步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而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門。但是，畜牧业的发展只有在草原地区的适当条件下才能真正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可是，广东全境山川糾結，森林密盖，沒有具备发展畜牧业的条件。据汉书卷九五南粵王传：“高后自临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异蛮夷，出令曰：‘毋予蛮夷外粵金鉄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顏注：“恐其蕃息”。可见直到西汉，广东的馬、牛、羊等牲畜，还未见得大量繁殖（即使到了现代，畜牧在广东还只作为农业的附属部門）。当然，也不能認為当时广东完全沒有畜牧。在一些遺址里，发现了牛、羊、猪等骨头，虽数量还不多，但亦足以說明当时确已豢养牲畜。

在手工业方面，首先是制陶业迅速发展起来，而且漸趋于完善的阶段。陶器是最大量的遺物，它可分成夹砂粗陶、泥质軟陶和硬陶三种，其中印紋硬陶非常普遍。陶器的

形制复杂，有碗、钵、罐、盆、豆和甕等等，用以盛水和食物的大型陶器也发现不少。这些发现，表明当时人们已能按照不同的用途制造各种器皿，也表明当时人们已过着定居和日趋丰富的生活。陶器的制作，分手制、模制和轮制，后者在较晚期才能掌握。纺织业在这时也相当发达了，在许多遗址里都发现了陶制或石制的纺轮。人们利用纺轮将兽毛和植物纤维纺成细线，再用原始的织具编织衣物。遗址里所发现的骨针，缝缀衣物当然是它的主要用途。此外，人们还用石、骨、陶和骨等材料制造各种装饰品，如环、玦、耳坠和管等等。

关于当时人们的居住形式，目前在广东省还没有足够的考古材料来说明。但在文献上，有关于广东原始居民“巢居”^①和居住“干栏”的记载。“巢居”或“干栏”是一种用茅草竹木搭盖的，特征是楼板与地面隔离，或建筑于高树之上，或楼板下用木桩支持。这种“干栏”是流行于我国西南、包括广东在内的原始住宅形式^②。此外，广东省近年来清理的汉墓亦有“干栏”式房屋明器出土。可见对于气候潮湿、多雨的广东地区来说，原始居民居住“干栏”会比北方干燥地区的竖穴式房子更为可能的。到目前为止，广东省尚未发现过足以置信的房屋基址，只在潮阳金溪水庫遗址发现有柱洞遗迹，但尚未能明确其建筑性质。因此，对于广东原始居住形式的问题仍待今后继续深入探讨。

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原始氏族社会走上新的阶段，即从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一般说来，向犁耕农业和畜牧业的过渡，是由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经济基础。可是，各地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在一些既没有农业，也没有畜牧业的社会中，同样也发生了由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因为这一过渡的基础的实质，“乃是生产力的总的发展，即不依这些或那些个

别生产活动部门为转移的生产力的总的发展。”^③

广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畜牧业不发达，也未向犁耕农业过渡。但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业、捕鱼业、狩猎和手工业都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农业和捕鱼业成了生产活动中的主要部门。随着锄掘农业的发展和日益复杂化，男子也逐步参加到这一生产活动的部门中来了。而在捕鱼业中，男子显然是占居主要的地位的。因此，广东的原始氏族社会从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是有它的特点的。然而，捕鱼业的发展，毕竟比不上畜牧业那样迅速和先进，而男子在锄掘农业中逐渐取代女子而居主要地位的过程也不是容易的。这个情况，可能使第一次劳动大分工的出现较为延缓，同时也是可以说明广东原始氏族公社晚期的发展和解体过程比中原地区较晚的一个因素。

四、

据文献记载，我国东南沿海在古代是吴、越族的活动范围，他们在文化、语言和风俗习惯上都有许多共同之点。从现在这一广大地区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物，如其中最具普遍性的红色、灰黑色的夹沙粗陶和泥质细陶和背部隆起、方形或梯形石磬看来，可以说明吴、越族是同一文化系统的。早在商代（公元前十二世纪）以前，广东的越族也和居住江、浙一带的吴、越族以及和中原发生了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密切关系。如广东省发现的长身式和短身式石斧或石锛就广泛见于长江下游和北方，双肩石锛见于中原的

^①晋张华：“博物志”第四，称：“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

^②戴裔煊：“闾——西南中国原始住宅的研究”，第五九至六七页，一九四八年，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

^③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纲”，第一三八页。

仰韶文化遺址^①，具有龙山文化特征的蛋壳黑陶在粵东区亦有发现。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八至三世紀），居住广东的越族，和中原地区在經濟上和文化上的交流更为显著了。在广东新石器遺址里，我們較为普遍地发现了仿中原青銅器的戈、矛、剑等石制武器和圭璋等礼器，以及仿青銅器形制和紋飾的陶器，如豆、鼎之类的器皿。

由于受到中原封建社会經濟和文化的影響，加速了广东原始氏族公社的解体过程。正如上面所談到的，由于广东地区畜牧业不发达和沒有正式过渡到犁耕农业，因此原始氏族公社的解体过程是相当緩慢的。然而，原始氏族社会末期，私有财产已經在内部萌芽，部落酋长和軍事首領已产生，本已具备了向階級社会过渡的条件，同时受了中原封建經濟文化的影響而加速氏族公社的分解。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規律，氏族社会解体后进入奴隶社会，但根据目前广东考古材料，对广东奴隶社会尙无充分証迹，还有待于今后的发现。

从原始氏族社会的解体到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在整个广东地区來說是不平衡的。根据目前考古学和民族学的考察，广东有些地区，新石器时代結束較早，有些地区結束較迟。例如，据民族調查，黎族地区的奴隶制残余是极微薄的，其腹地区域直至唐宋（公元七至十三世紀）尙未完全脱离原始社会，明清以后仍保留着原始氏族社会的若干残余形式，如五指山地区带有父权家长制形式的“合亩制”。

五、

最后，关于广东原始居民的来源問題，据汉书地理志顏师古注引臣瓚說：“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粵杂处，各有种姓。”“百粵”的名称，表明居住在我国东南沿海的粵（越）族，包括許多部落。这些部落的

文化特征及其分布，就文献記載和目前的考古材料，目前只可以了解一个大概情况。

文献上所載的粵（越）族，在時間上和空間分布上，甌越和閩越大致是和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的有段石斨的分布区域相符合；南越和駱越則又大致与广东新石器时代的双肩石斧的分布区域相符合。

有段石斨还分布在我国台湾以至菲律宾、夏威夷一带。这些情况，近代学者有認為是从大陆传布到海島，又有認為是从海島传进大陆的，但各說均无确据。以地域相互邻近，看来大陆和海島之間的互相影响則还是可能的。现代苏联学者格·伊·列文遜認為公元前一千年（引者按：相当于我国西周时期），菲律宾的文化是受中国影响的。^②

与列文遜的意见相反的，則为意籍神甫麦兆良。^③他認為海丰的原始居民主要是經柬埔寨、香港来的西方种族，与“仰韶文化”同源。其說与安特生的“理論”基本一致；所不同的，只不过是安特生認為西方文化是从西北传入中国，而麦兆良則主张从南部传入而已。麦兆良只根据他的局部地面調查和相隔不远而带有若干差异現象的遺址，把不同用途和形状的磨光石器以及質料和紋飾不同的陶器，孤立起来論断种族差异，实属荒謬。

粵东沿海，自宝安县以西，包括粵中、粵西、雷州半島和海南島，为双肩石斧的分布地带。双肩石斧的分布，除广东外，还及

^①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西郊仰韶文化遺址发掘簡报，图版壹、16，见考古通訊，一九五八年第二期。

^②Ф.Н.ЛЕВИНСОН: ФИЛИППИНЫ ГЕОГРАФИЗ, МОСКВА, 1953, 中譯本：“菲律賓”，第一五至一六頁，一九五五年，中国青年出版社。

^③麦兆良：海丰史前遺物发现記，香港自然科学家（杂志），一九三八年，第八卷第三至四期。譯文见：“說文月刊”，一九三九年，第一卷第一至第三期。

于国外的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一带。因而也有人认为，使用双肩石斧的人是由南洋一带向北移入我国的。但根据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在西樵山所发现的石器，说明广东的双肩石斧出现在新石器时代初期，这一发现，表明广东原始居民使用双肩石斧有其悠远的渊源。在柬埔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里，曾发现过双肩石斧与汉代的青铜器共存；①越南新石器时代遗址里同样曾发现双肩石斧和汉代流行的饰有波浪纹的陶碗共同出土。②这都说明柬埔寨和越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曾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综上所述，从解放后广东省所发现的石器时代考古材料，说明了广东自有人类居住以来，已经有了约二、三十万年的历史。我们的祖先长期和自然进行顽强斗争，经历了原始社会的各个发展时期，创造了自己的文化。从考古特征中也可以说明，广东古代民族和中原不同，但在很久以前，特别是见于文献的商周以后，不断和中原发生了经济上

和文化上以至血统上的交流融合，和生活在祖国辽阔土地上的各族人民一起，在与自然进行勤劳勇敢的斗争中，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远古历史文化。并且和邻近国家的各族人民在远古时代就发生过文化上和血统上的交流融合，写下了与国外各族人民友谊历史的最早的一页。

(附志：本文是根据广东省博物馆筹备处和本教研组考古普查发掘的材料写成的，其中有若干论点，特别是西樵山遗址的性质问题和广东原始社会过渡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本文的发表，意在抛砖引玉，希望能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①小林知生：《东南亚考古学》，载：“日本考古学讲座”，一九五六年，第二卷第一四八至一五零页。

②印度支那地质调查所埃提恩·巴特：在东京（中圻）附近塔姆村发现的保陀湖新石器时代残器和庖厨用具，文载 *Etienepatte* 二四卷第三至四期，第五二一页，一九二四年，（法）远东考古博物院。

广州市考古学界讨论广东原始社会史问题

广州市考古学、地质地理学、民族学等方面的专家和科学工作者于十一月中旬举行了广东原始社会史问题的讨论会。这次讨论会由中山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研组主持。该组在会上提出的集体写成的论文“广东原始社会的探讨”，是集体研究的成果。讨论会上，发言都很踊跃。关于西樵山遗址性质问题引起了争论。省博物馆莫稚同志认为，应根据遗址的主要特征——最进步特征来断定其时代。他说，西樵山遗址的石器制法进步，陶器与打制石器同出一层，因此，这遗址应属于新石器时代初期；中山大学地理系徐俊鸣教授在关于广东石器的区域分布问题的发言中，认为广东石器的区域分布可能与当时河海限制有关。

发言者一致认为：力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探讨广东原始社会的历史，是有重要意义的工作。但是，中山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研组提出的论文，在叙述广东从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原始社会的解体和向封建制过渡等重大问题时，材料尚感不足。要更好地解决广东原始社会史的问题，还有待考古学、古代史、民族学、地质地理学等方面的专家和科学工作者的进一步共同努力。（遵）

試論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及其成长

吳宏聰

在世界文学行列里，中国现代文学是比较年青的文学。它比之有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学和有四五百年历史的欧洲资产阶级时代的文学，历史要短得多。但由于我国现代文学继承了我国几千年来优良的文学传统，吸取了外国进步文学的宝贵的经验，特别是近五十年来苏联丰富的社会主义文学经验，而又和最先进的阶级、最先进的思想、最近十年来又和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相联系着，所以在短短的期间就有了过去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巨大发展。我们有象鲁迅这样伟大的文学巨匠，有郭沫若、茅盾等这样举世知名的文学家，有在解放前写了许多作品的夏衍、田汉、老舍、曹禺、巴金、张天翼等作家，也有解放区成长的周立波、赵树理、刘白羽、李季等大批为群众所熟悉的作家以及杜鹏程、梁斌、王汝石、曲波、馮德英、聞捷、王老九、刘勇等作家和工农作家。我们有“狂人日记”、“阿Q正传”、“女神”、“子夜”和“日出”等这样充满了热烈的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的作品，也有“暴风骤雨”、“李家庄的变迁”、“白毛女”、“王季与李香香”、“红旗谱”、“红日”、“林海雪原”、“在和平的日子里”、“赶车传”、“动荡的年代”、“烈火红心”和“万水千山”等闪耀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光芒的小说、诗歌和戏剧……四十年来的新文学深刻而广泛的反映了中国人民革命进程的生活和斗争，塑造了许多动人的形象，这一

切都将丰富着世界进步文学的宝藏。

但是“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和以前的文艺有什么不同呢？在性质上有什么区别呢？这个问题，过去是被搞得十分模糊的。反动统治阶级和御用文人，为了达到歪曲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真实面貌，以求符合旧中国反动统治者的利益，曾别有用心地歪曲过现代文学的性质。例如胡适便说新文学是“白话文学”、“国语文学”。他认为凡是用白话文写出来的便是新文学，用文言文写出来的便是旧文学。他企图从文学形式着眼而不触及文学的社会内容和阶级内容，把表现工具当作区别新旧文学的标准。在他写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谈新诗”、“逼上梁山”等文中，就反复的宣扬着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的文学观点，并且把“五四”文学革命说成是文学工具革命。他说：“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大解放。……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指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引者）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谈新诗”）胡适把文学的内容形式割裂开来，否认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否认文学形式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由于社会生活的发展，由于文学内容的要求。因此对中国文学历史的发展得出了十分荒谬的论断：“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逼上梁山”）另外还有一些人也是单纯从文学的表现形式来区别新旧文学的。他们认为利用从欧美搬运来的

文学形式写作的，就是新文学，利用中国旧有形式来写作的则为旧文学。结果同样掉进了形式主义的泥坑里，无法正确说明新文学的性质。“五四”时期，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如“国民文学”说，“平民文学”说等等。前一种说法是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里最先提出来的。他在“三大主义”中把贵族文学与国民文学、古典文学与写实文学、山林文学与社会文学对立起来，多少触及了文学的思想内容，但对于文学的社会基础、阶级基础，依然说得十分含混。后一种说法是周作人在“平民文学”一文中提出来的，他认为新文学必须是平民的文学，不能是贵族的文学。但这“平民”，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出的“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

考察某一时代的文学性质，不能离开某一时代文学所由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时代背景，更不能离开阶级分析的方法。上层建筑由基础产生而又为基础服务。“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①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对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基本观点。文学艺术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它的根本性质是决定于社会现实的客观存在的。在阶级社会里，它是阶级倾向底宣传之最普遍、方便、简单和制胜的手段。高尔基曾这样说过：“文学是社会的阶级和集团底意识形态——情感、意见、企图和希望——之形象化的表现”。如果不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出发，那我们就没有法子说明在阶级社会里为什么有为不同阶级服务的文学艺术，更没有法子说明它的阶级倾向、阶级性质了。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发生于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它经历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作为反映并

服务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现代文学，决定它底性质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新旧民主主义文学有什么区别？而这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的文学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认为这些问题除了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出发，结合具体作品进行考察外，还必须把它与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运动联系起来。这不仅由于中国新文艺运动与中国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离开了中国现代人民革命斗争，中国现代文学就不可能发生和发展，而且还由于中国新文艺运动是在共产主义思潮指导和影响下，才具有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性质。中国革命，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形成了新的历史特点。中国革命在“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1919年的“五四”运动便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无产阶级已经登上了历史政治舞台，中国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就不能不由无产阶级思想来领导。这个运动虽然就其任务来说，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但与旧民主主义文化运动已经根本不同了。郭沫若同志1949年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对于中国新文艺的性质，曾经作了极其扼要的说明。他认为：

“‘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艺已经不是过时的旧民主主义的文艺，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艺”。他根据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一个观点，来表述中国新文艺的性质，无疑的是正确的。正是中国革命这种性质，决定了中国新文艺的性质。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进行了一些政治上的变革，如1889年的改良主义性质的戊戌变法运动，1911年的辛亥革命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命，便是規模較大的政治運動。與這些政治變革相適應，資產階級在文學上也作了許多變革，不論是維新派（康梁派）或是革命派（孫中山派），為了要從文化思想戰綫上擊敗封建頑固勢力，他們都從本階級的立場和利益出發，吸取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社會學說和文化思想，來和封建文化的代言人，展開了文化戰綫上的鬥爭。梁啟超、黃遵憲等人還提倡新文體，提倡“小說界革命”、“詩界革命”。在政治運動中，曾經起過積極的作用。19世紀80年代以後（中日甲午戰爭以後），許多資產階級政治家和作家，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黃遵憲、章太炎等人，已經有意識的把文學作為武器來進行社會鬥爭和政治鬥爭。但是由於帝國主義時代的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和動搖，在政治上不可能堅決的徹底的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舊民主主義文藝也就沒有達到它應有的思想藝術高峰，具有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性質。

“五四”以後的新文學是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由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黨的文學。這裡，無產階級思想領導是“五四”以來新文藝具有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性質的關鍵，也是“五四”以來的文學能夠不斷隨着革命形勢的發展、沿着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向前進的關鍵。由於中國的具體歷史條件，在工人階級政黨出現以前，便開始了共產主義思想指導下和影響下的新文學革命運動，因此，有些人就不能正確地理解這一個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問題。

在黨成立以前，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做了兩件大事，一件是十月革命後，李大釗同志等在北京建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1918），有意識地搜集有關馬克思主義資料，進行討論和研究。另一件是在報刊雜誌上大力宣揚了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這兩項工作似乎與文學革命運動沒有直接關係，但卻對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作家以及

其他文學工作者起了啟示的作用。共產主義思想成為當時最富生命力的思潮，它指出了文學前進的方向，革命的作家都是沿着這個方向前進的。魯迅在“自選集”自序里，就說過他的“吶喊”是“聽將令”的，他是深受當時的共產主義運動前驅者的影響的。這些歷史事實表明，還在黨成立之前，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在文藝的領域里已經得到深刻的反映。魯迅正是在無產階級思想影響下，衝破了資產階級文學思想種種局限，揭開了中國文學的新頁。毛主席指出：“‘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當時運動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綫的革命運動。”而五四運動以後、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中國的新文學運動，就在黨的直接領導之下發展壯大。

在探討無產階級領導思想這一問題的時候，有兩種看法是必須加以澄清的。一種是認為“五四”時期的文學作品，極大多數是小資產階級作家的作品，因此“五四”時期的文學是小資產階級的文學；另一種是認為“五四”時期有許多進步文藝團體，它們形成了各種不同的流派，因此似乎就不能說是在一種共同的思想領導下展開文學活動。這兩種看法，在實質上都是否定了無產階級領導思想對中國新文學革命的重大意義。“五四”時期的作家，包括當時的魯迅、郭沫若等在內，絕大部分還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是事實。就他們的世界觀來說，都還不完全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但他們都是有徹底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正在萌芽生長着的社會主義思想，因此，他們的創作，或多或少地體現了當時人民大眾首先是無產階級的政治要求和願望，具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因素。這是他們接受無產階級領導的思想基礎，也是他們的文學活動具有無產階級文學傾向的標志。那麼怎麼能夠把以這些作家和作品為中心的

文学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呢？

就当时的进步文艺团体来说，比较著名的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未名社、莽原社、太阳社等，这些文艺团体都出了期刊或丛刊，如“小说月报”、“文学旬刊”、“创造季刊”、“创造周刊”、“创造日”、“语丝”周刊、“未名”丛刊、“莽原”等等，影响较大的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代表着中国两大文学流派的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两个文学团体，在文学主张上和创作方法上都不同。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一般来说，文艺团体不像政治团体的组织严密，因此，在同一个团体中的成员的文学主张并不是绝对一致的，就某一作家或文学理论家来说，他的文学主张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虽然有着“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之争，但他们的创作实践和文学活动的总的倾向，却是朝着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文学史上的事实，已经为这一问题作出了结论：就其思想倾向来说，基本上都是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文学。

同时，由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中国现代文学经历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区的革命文学活动和解放区的文学活动也表现了它们各自的特点，但就它们的性质来说，都是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文学；指导这一文学前进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它的体现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观点与中国革命文学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奠定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及其所引起的变革，可以说是继“五四”

后第一次更伟大、更深刻的文学革命。这个讲话，总结了自“五四”至一九四二年这一长时期的革命文艺运动的重大原则问题，批判了那一时期出现在文艺界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所指出的：“这个讲话，在中国革命文艺运动上第一次明确地深刻地解决了文艺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文艺和工农兵群众结合的问题，并由此给文艺工作者和一切革命知识分子指出了如何改造自己以求得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如何为工农群众服务的正确道路”。（1952年5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中国现代文学，不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文学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的文学，都具有鲜明的阶级倾向和共同性质。当然，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开端的革命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是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一个更为成熟的阶段。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反映了工农兵的生活和斗争，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理想和愿望，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成为党在各个时期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及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工具。

由于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我们的伟大祖国从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世界上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新的现实生活，赋予文学以新的任务，并为中国文学事业开辟了宽广的天地；同时，在党的“百花齐放”的方针鼓舞下，全体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投身到热火朝天的群众斗争中去。因此，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品不论在反映新的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或是在人物形象的创造，语言风格等方面，都有显著的进步，其进步的速度远远超过以前的三十年。去年以来，在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大跃进形势下，文学事业出现了朝

气蓬勃，多姿多采前所未有的万千景象。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正面的英雄人物已經在我們的文学作品中占了极其主要地位，突出地反映了今天的伟大的时代精神和人民生活的崭新的、丰富的内容。小說“保卫延安”中的周大勇、王老虎，“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紅旗譜”中的朱老忠，“百炼成鋼”中的秦德貴，“在和平的日子里”的閻兴等，便是大家最熟悉和喜爱的艺术形象。在我們的散文詩歌中，时代的气息是十分浓郁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尤其显著。象魏巍的散文，李季、田間、聞捷、賀敬之、郭小川等人的詩歌，都是时代的贊歌，音色强烈、色采鮮明，洋溢着无限的革命激情，交織着人类美好前途的画面。去年以来，反映大跃进的新民歌，更是时代的瑰宝，是共产主义文艺园地里的嫩芽。我們的时代是一个英雄时代，我們的文学充滿了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我認为，革命英雄主义成为作品的主要基調，和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阶段的文学进一步成熟的主要标志。在这里，我們很清楚看到，继承过去三十年的无产阶级的文学传统而发展和逐日成熟的我国现代文学，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文学一样，正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学艺术的高峰高歌迈进。

二

也許有人会这样想：文学艺术既然是一种社会意識形态，而中国现代文学又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它到底是怎样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呢？这里，牽涉到的問題是很多的。但是作为反映四十年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和建設社会主义的现代文学，它的发生和发展是与社会和人民的全部历史生活的发展密切联系着的。四十年来我們走着一条十分不平凡的道路，从二十年代起，我們便在交織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社会里展开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学运动，如何在艺术的实

践中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粉碎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开辟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就成为我們文学上最尖銳的课题。因此，在我們的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就表现出它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显著的特点，同时又是在文艺战线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开始便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服从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所规定的革命任务。因此，这个特点也就格外鮮明。

无产阶级的文学，从它出现的那一天开始，就公开地宣称要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服务。“五四”前期，（党成立前）反帝反封建还没有作为革命斗争的中心口号提出来，当时的口号是民主和科学。但是继承了中国悠久的、丰富的文学遗产中一切优良传统的新文学，已经开始把文艺和民主科学思潮联结起来了。1919年1月，“新青年”编者发表了一篇“本志罪案答辩书”，公开宣称：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这里，“新青年”的编者虽然没有全面论述民主和科学的思潮与文学革命的关系，但它已经表明新文艺运动是跟当时要求民主和科学的运动，一同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关于这一点，我們可以从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特别是鲁迅和郭沫若的作品中找到证明。

1918年鲁迅发表了他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他滿含着对统治者的憎恨，对被迫害者的同情，无情的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猛烈的抨击了几千年来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他大声疾呼，号召大家起来推翻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灯下漫笔”）。在鲁迅以前，我們还没有看到有人能运用文艺这个武器对封

建制度进行这样无情的揭露，这样勇敢的抨击。这篇小說所反映出来的社会意义及其所发生的政治作用，已远远超过了作者自己的意图，成为“五四”时期反封建主义的最有力的宣言。在“阿Q正传”这部名著里，鲁迅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落后的贫苦农民阿Q的典型形象。通过这个形象，鲁迅有力的揭露和鞭撻了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精神上的奴役，同时，对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失败，也作了严正的批判。在“孔乙己”、“药”、“祝福”、“故乡”、“伤逝”等小說以及当时他写的许多杂文里，鲁迅同样以他对现实的惊人的洞察力和高度的艺术概括才能，抨击了封建社会及其代表人物。伟大的鲁迅，奠定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础，树立了中国现代文学为政治服务的革命传统。

郭沫若也是“五四”时期反帝反封建的文学战线上杰出的战士，有人把他那时候写的詩比作是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军的号角。郭沫若早期的詩歌，如“女神之再生”、“凤凰涅槃”，表现了对一切黑暗腐朽势力的诅咒和痛恨，对一切光明新生美好事物的爱恋和頌扬的精神，他那种强烈地追求个性解放，反抗一切因袭传统，和彻底摧毁一切腐朽势力的革命浪漫主义的热情的篇章，深刻地反映了“五四”时期中国人民的政治要求，对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起了巨大的影响。

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文艺在蒋介石的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下，更加深入了。工农民主政权地区的建立，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从此，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便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最中心最生动的内容。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党的领导和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是现代文学最根本的问题）。因为“五四”以来，包括左联时代的左翼文学在内，一般只能在知识分子的范围内发生影响，和广大劳

动人民群众差不多没有什么联系。而工农兵文艺的出现，便使文学从少数人手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犀利武器。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在理论上得到了最科学的概括，在实践上也有进一步的发展，文艺的面貌，文艺工作者的面貌，都有了根本的改变。中国现代文学已经明确地自觉地走上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道路。1942年以后出现的“小二黑结婚”、“王季与李香香”、“白毛女”、“刘胡兰”这一类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的工农兵文艺，对群众或干部，产生了极大的动员作用和教育作用。农民和战士看了“白毛女”、“血泪仇”、“刘胡兰”之后，都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和仇恨，愤怒地叫出了“为喜儿报仇”、“为刘胡兰报仇”的口号，当时有的部队还组织了“刘胡兰”复仇小组。文艺与人民、与政治关系是如此密切地联系起来。

在解放战争的年代里，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的传统，继续得到了发挥。战士枪杆诗，火线传单、阵地画报、快报诗歌等等形式的工农兵文艺广泛流传，就是明证。周扬同志在“新的人民文艺”一文中，曾经举过许多生动的事例。其中一例，是说有个解放军战士，写了一首这样的诗：

我的七九枪，
擦的亮堂堂，
这次去反攻，
拼命打老蒋。

——我的七九枪

后来这首诗的作者，在战场上真的喊着“我的七九亮堂堂”勇敢无比向敌人冲去！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地区，党领导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在更坚苦和复杂的情况下，也是坚持为政治服务的方针的。“五

四”以来，以鲁迅为首的进步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为文艺与政治结合、与广大群众结合，曾经作过不少的努力和探索；大革命失败后很多革命作家（党与非党的）在党的领导下还与国民党反动派作了极其顽强的斗争。柔石、胡也频、白莽、应修人等同志，便是在白色恐怖下，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许多不朽的文学作品。在1927—1937这十年间，国民党统治区革命文艺接受了党的领导，在反“围剿”的斗争中成长了。茅盾的“子夜”，便是这个时期一部出色的作品。它历史地、真实地反映了三十年代，由民族危机的加深而产生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命运。同时热烈的歌颂了革命运动和工人群众的斗争，有力的打击了托派分子扬言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谬论。对当时革命斗争起了积极作用，因而引起了革命文坛和读者的注意。1933年“子夜”问世的时候，瞿秋白同志曾说：“193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要记录‘子夜’的出版”。

“七七”事变以后，由于客观形势的要求，各种文艺形式如报告文学、街头诗，街头戏剧等都被用来作为发动民众，捍卫祖国，反映投降，坚持抗战的武器，抗战前夕已经流行的“放下你的鞭子”便是当时起过巨大政治效果的街头剧。战争初期，在党的号召和动员之下，不论是诗人、小说家或是戏剧家都集中其笔锋，歌颂和表现在民族斗争的前线和后方涌现的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事迹。象田间的“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岗位们”、“给战斗者”；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东平的小说“第七连”和集体创作的话剧“芦沟桥”等都是教育群众、鼓舞群众的有力武器。抗战期间，蒋介石反动集团执行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两面政策，但抗战文艺在党的领导下仍然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为反对分裂、反对妥协投降、争取民族团结和最后胜

利而斗争。郭沫若的“屈原”、“虎符”，夏衍的“心防”，茅盾的“腐蚀”等戏剧小说便是从不同的题材，反映了这场斗争的内容和意义。充分显示了我国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特色。

解放十年来的文学，在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高潮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繁荣，也特别显著地表现了为政治服务的这一特点。十年来，我国文学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我国人民的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变化，产生了艺术性、思想性都很高的文学作品，而这些文学作品又反过来推动了生产建设和革命斗争。文艺服务于政治，这是无产阶级文学的一个基本方针。但只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艺上成为主人的时候；只有劳动群众不但接受了文学，而且直接参加了文学创造的事业的时候，这个基本方针，才能得到最彻底的贯彻执行。

应该说，这十年的文学比起以前任何时期的文学作品，都更出色地完成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任务，更充分地显示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特色的。“三千里江山”，“上甘岭”、“谁是最可爱的人”“杨根思”“东战”以及其他描写抗美援朝的作品，不正是以中国人民志愿军高度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教育千千万万的读者么？“不能走那条路”、“三里湾”、“山乡巨变”“三年知道”“卖菜者”、“井下”不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么？“百炼成钢”、“火车头”、“风雨的黎明”“潜力”三部曲“万古长春”、“谁是奇迹的创造者”、“黄埔的浪潮”不是相当深刻的描绘了祖国的工业建设和新型工人的成长么？“在茫茫的草原上”“草原烽火”和“欢笑的金沙江”不都生动的反映了党所领导的各族人民的斗争吗？其他如那些描写民主革命时期党所领导的惊天动地、坚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的文学作品，象大家熟悉的“红旗谱”、“红日”、“青春之

歌”、“林海雪原”、“火光在前”、“开不败的花朵”、“苦菜花”、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以及“我的一家”、“红旗飘飘”等的革命回忆录形式的作品，更以它动人的艺术魅力，刻划了许多崇高、动人的英雄形象。吸引着人们如饥似渴的从过去的英勇斗争和英雄事迹中吸取力量，找寻榜样。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时代，以其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哺育了新的和老一代的艺术家们，为诗人、画家、戏剧家、小说散文作家探索、追求、创造新的艺术风格，艺术形式，提供了肥沃的泥土。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词的发表，更给文学界以极大的鼓舞。现在有许多作家如郭沫若、田汉、赵树理、欧阳山、杜鹏程、梁斌等都以其多种多样的艺术风格，摹写下闪耀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光芒的时代画卷，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百花坛上绽放异彩。

既然我国现代文学，是以它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主要特点的文学，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就必然要与一切对敌的文艺思想展开斗争，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又是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发展和成长起来的。

文艺上的思想倾向的斗争总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的。刚诞生的苏联文学，在十月革命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便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展开了激烈斗争的史实，是许多读过苏联文学史的人都熟悉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发展情况也和苏联一样。四十年来我们的文学经历了一系列的尖锐的思想斗争，这些斗争，概括起来也就是文学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从五四开始，中国文艺思想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就存在着和发展着。

从社会政治思想斗争来讲，“五四”时期是最激烈的时期之一。共产主义思想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而广泛传播，资产阶级便集中了全力和无产阶级思想展开斗争。在

这个时期中文艺思想斗争虽然与左联时期不同，资产阶级还没有完整的提出一套理论，但它却首先在文艺思想的核心——哲学的领域里开展了一场生死的搏斗。“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就是这场搏斗的具体化。一个阶级的哲学观点与文艺观点是一致的，不能把“问题与主义”的论争看作与文艺思想斗争无关的事，这场论争，归根结底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的斗争，而世界观的问题恰恰是文艺思想上最重要的问题。虽然在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五四”时期文艺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形势是比较复杂的，但在实质上是反映了两条道路的斗争。

左联时期，文艺思想上的斗争，不论从广度深度来讲都是罕见的。首先，因为这个时期是反革命“围剿”和革命深入的时期，阶级斗争特别尖锐，加上1931年以后民族危机的加深、各种矛盾错综在一起，反映在文艺思想斗争上，就显得十分复杂十分尖锐了。其次，因为大革命失败以后，资产阶级完全站到反动方面去了，他们投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他们的斗争锋芒，完全指向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文学。所以当30年代我国无产阶级文学作为一个强大的力量在文坛上初露头角的时候，我们就遭到了“新月派”的梁实秋等和自称为“自由人”的胡秋原，所谓“第三种人”的苏汶和“民族主义”文学派的进攻。他们十分卖力地鼓吹文学是“表现人性的艺术”；文学“没有阶级性”；文学应当绝对“自由”；真理和文学同革命不能并存等等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但是，由于党的坚强领导，以鲁迅、瞿秋白为首的革命文艺，打垮了各种反动文学流派的进攻，粉碎了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一切超阶级超政治的谬论，宣扬了马列主义文艺思想，锻炼了革命文艺队伍，捍卫了革命文艺事业。与反动派的愿望相反，反革命“围剿”

带来的不是革命文艺的絕灭，而是年輕的革命文艺的成长，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终于成为当时文艺运动的主流。

在抗日战争时期，文艺思想上的斗争依然是激烈的。我們严厉的批判过梁实秋的“文艺与抗战无关”的謬論，摧毁了各种买办文艺和汉奸文艺。在延安又进行了对托派王实味的斗争，揭露了王实味、肖军的反动文艺思想。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这一时期以前文艺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的总结，同时，又是这一时期以后保证革命文艺在两条道路斗争继续取得胜利的最犀利的武器。

全国解放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期，文艺思想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阶段中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

1951年我們首先展开了对电影“武训传”所表现的反人民反历史主义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的斗争，这场斗争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投降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主义的斗争。接着1954年我們又展开了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这场斗争表面上只是一个对古典作品评价的问题，实质上却是一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斗争。1955年至1956年在全国范围开展的对胡适的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学思想的批判，和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斗争，则是我国现代文学两条道路斗争中的具有重要意义战役。经过这场斗争，我們清除了几十年来胡适思想的反动影响，划清了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界限，巩固和树立了

馬克思列宁主义在学术思想上的领导，并且粉碎了胡风集团的反革命阴谋，給文艺上最反动的理論以致命的打击。

1957年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对党的文艺事业的进攻，是资产阶级最大一次进攻。这场斗争的胜利，不但粉碎了来自党外的资产阶级反动的文艺势力，而且清除了丁玲、陈企霞、馮雪峰、艾青、秦兆阳等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在这场斗争中，我們彻底批判了右派分子的反动文艺思想和修正主义分子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为1958年文学大跃进，开辟了百万大軍馳騁纵横的康庄大道。去年以来，大批优秀的小說，戏剧、詩歌和散文的涌现，就是这场斗争的丰硕果实。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反映着我国各个革命时期中的两个阶级的斗争，这就从根本上标志着它的鲜明的阶级性，说明着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也是列宁在“党的組織和党的文学”一文中所提出的“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的原理在我們现代文学实践中的集中表现。

以上是我个人对中国现代文学性质及其成长的一些粗浅的理解，限于水平和閱讀范围，我只能从文学史的角度就文中所提出的問題作一般的論述。性质和特点的概括是不全面也不中肯的，結合具体作品来分析、論証就更加不够了。四十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輝煌的成績，可以断言，中国现代文学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飞跃发展，在现实生活的肥沃土壤上，迎着朝阳，开出更为灿烂的花朵。

短論与隨筆

小論个人主义的品种

燕 如

正如生理上患病的人会“諱疾忌医”一样，思想上患病的人也会“諱疾忌医”。

在检查自己的个人主义的时候，有些同志同嗜酒的人买酒时所想的相反。嗜酒的人买酒之时，总想买到那够味的酒，他觉得醇酒比淡酒好；而那些同志呢，他觉得把个人主义的性质說得越輕越好，把个人主义在思想里的含量說得越淡越好，他耽心照实直說出来，会对自己有什么“不利”。于是，他就轉弯抹角，反复推敲。个人主义这一路貨色，也就有着名目繁多的品种了。

常见的品种之一，是所謂“个人患得患失心理”。

这一个品种之所以比較流行，大概是基于如此一种想法：个人主义有“积极”“消极”之分，“积极”的个人主义是采取攻势的个人主义，它向外伸手，損人利己，性质严重，罪状不小；“消极”的个人主义是采取守势的个人主义，它終日惶惶，惟求自保，性质輕微，其情可恕。“个人患得患失心理”，归入“消极”的、采取守势的个人主义那一类。你看吧，它一不向外伸手，二不有損于人，虽然没有做到大公无私，可是私却私得有限；它所經之营之的，只是那么一点“渺小的存在”，现在放不下的“包袱”，不过是恐怕那一点点的失去。这样的个人主义，同那些积极钻营、野心很大的个人主义比較起来，不是“值得”原諒的一种个人主义嗎？

据說，这种个人主义“值得”原諒，还因为它“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自私心理的表现。小资产阶级思想比资产阶级思想“好”，小资产阶级思想那頂“帽子”的号数比资产阶级思想那頂“帽子”的号数“小”，所以“个人患得患失心理”的存在，也就“不是”什么严重的問題了。

常见的品种之二，是所謂“有点儿名位观念，而主要的是名”。

名位观念不是好东西，那是“創制”这个品种的同志所已經知道了的；然而他着重承認的是“名”。

“为名”是不是比“为利”和“为位”好呢？他們以为是“好”一些。因为这又基于这么一种想法：个人主义有“清高”“庸俗”之别。“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为名”的目的，当自己活着的时候，要别人瞧得起；死了之后，想别人忘不了。两袖清风，一介寒士，“清高”得很。不象那些“为利”之人，苟且营謀，貪得无厌；也不象那些“为位”之人，屈节卑躬，諂笑逢迎。这种封建士大夫“名节”观念的遺留，使得他們对于个人主义的看法有了另外一种奇怪的标准。用那奇怪的标准来考虑，觉得与其对人承認“为利”和“为位”，毋宁承認只是“为名”。“名”字連着“清高”，“利”、“位”同于“庸俗”，“清高”比“庸俗”好，如果要承認有个人主义，不如选择一种“清高”的个人主义。因为个人主

义虽然不好，但我有的是“清高”的那一种，似乎較之“庸俗”的那一种，又是“略胜一筹”了。

也許有人說，这样挖苦一番，不怕犯上“一概而論”的錯誤嗎？难道人們的个人主义，就是那么“清一色”的，在性質上、程度上，都不应当来个具体分析？

非也。这里沒有反对具体分析之意。对于帮助同志克服个人主义缺点，提高集体主义觉悟，是一定要作具体分析的。因为只有进行具体分析，把他身上存在的个人主义，在性質上、程度上，恰如其分地指明出来，并且找到产生的原因，提供克服的办法，才可以好好地帮助同志。“一概而論”，乱戴不适合的“帽子”，是会使人降低甚至失去克服缺点的信心和勇气的。

不过进行具体分析，绝对不是以重說輕，把大作小，“諱疾忌医”。对于自觉地检查个人主义的我們本身來說，首先还是要自己要求严格一些，挖掘深入一些，并且提到原則高度来看它的危害性。不这样，只去斤斤于品种之分，而沒有注意到存在于品种之中的更本质的东西，結果必然因为忽視了万恶之源的隱伏，从而不作及时的治疗。

就以所謂“个人患得患失心理”來說吧，你“患得”的是什麼？“患失”的又是什么呢？“患得”的难道不是耽心“得而复失”，而“患失”的不是惟恐少得一些个人的眼前利益嗎？老是为了一些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患得患失”，难道还会分心去想到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嗎？当个人的眼前小利必須服从于集体和国家的长远大利的时候，只知为个人利益，“患得患失”的人，能够設想他会

“公尔忘私”而不是“私尔忘公”嗎？

这样看来，虽說是“个人患得患失心理”，实际上就是一种可鄙的个人主义。这个品种的个人主义，当它得到个人利益的时候，可能采取消极防御的守势，一旦发觉到个人利益有不保之險，它就会一变而张牙舞爪，积极进攻了。

又以所謂“有点儿名位观念，而主要的是名”这个品种來說，你为的是什麼样的名呢？是个人的名；得了名，为的什麼？为的是个人。动机和目的，无非都是一个“我”字，这又“清高”到什麼地方去呢？何况名、位总是相連，名、利也总是相連，有时是有位才有名，才有利；有时是有名才有位，才有利，究竟哪个是主要的追求目标，自己是并不那么容易分得一清二楚的。

这样看来，表面上装得清高，实际上还是庸俗得很的可耻的个人主义。它和集体主义的崇高品質絲毫沒有共通之处。

要能認真地对待，必須是認真地重視；要能認真地重視，必須有足够的估計。“死老虎当活老虎打”，碰上活着装死的老虎，保险把它打死；要是相反，睡着的活老虎当它已經长眠，或者錯把凶狠的大虫作馴順的猫儿，未举拳头先松了劲，那就只有让它舒舒服服地吃掉。对待自己身上的个人主义，也应作如是观。須知它今日还小还輕，由于对它的存在沒有作出足够的估計，沒有及时地引起認真的重視，从而認真地去克服它，不知不觉間，小的变成了大，輕的发展到重，鑄成大錯，后悔已迟。

所以尽管品种繁多，我們千万別忘了，它究竟是：万恶之源的个人主义！

热 情 与 冷 淡

賀 青

每个人的脸孔，或多或少总有自己的特点，天下不可能找到两张绝对相同的脸孔；可是，如果就脸部表情来说，不外乎喜、怒、哀、乐，以及所谓“毫无表情”的平静的脸色。人们对待社会主义事业的态度，对各项工作的看法，尽管多种多样，千差万别；可是，如果就基本的态度来说，也不外乎革命者的积极主动态度；敌对分子的仇视态度，以及袖手旁观的人的冷淡态度。

敌对分子仇视社会主义，那是敌我矛盾的表现；他们的脑子就象摄影机的镜头一样，完全颠倒过来，我们喜，他们就怒；我们乐，他们就哀，这一般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我们且不去说它。

为什么在人民内部，对待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有些人表现了满腔热情，有些人却表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冷淡？

这是由于人们的立场不同，世界观不同，因而所持的态度也就不同。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抱着主人翁的态度，自觉地、积极地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之中，把自己的命运同社会主义事业联结在一起，他们对待社会主义事业和群众运动，自然就满腔热情。可是，那些持资产阶级立场，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又不愿意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改造思想，自外于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群众运动，袖手旁观的人，他们对待社会主义事业和群众运动，自然就是冷淡的了。

人们也许会說，既然广大干部和群众对

待社会主义事业抱着主人翁的态度，袖手旁观的只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那就让他们去持超然态度吧，对社会主义事业无伤大体。这话不对。是的，创造历史和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是人民群众，少数持旁观态度的人的确对历史的发展无能为力。但是，正如“超阶级”之不过是骗人的鬼话一样，袖手旁观的人的所谓超然态度也只是一种伪装。他们既然是在我们的社会里生活着，就不可能是装在玻璃柜里的腊象，可以与世无干，而是会起作用的；问题在于这个作用不是促进，而是促退。当一个新生事物在地平线上出现的时候，他们首先反对一气，频频提出警告：“当心别出乱子！”或者是唉声叹气：“困难啊，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而当群众不理睬他们的“警告”和叹息，仍然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时候，他们就板起脸孔：“哼，看你们搞得出什么名堂！”等到伴随着巨大的成绩，也有那么一点儿缺点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大叫“大事不好了”，“我早就说过不能干……”，惶惶然不可终日，甚至幸灾乐祸，为自己的“先见之明”兴高采烈！

也许有人会皱起眉头发问：“这些人敢情是神经有点不正常？”

要是这样想，那就未免太天真了。

前面说过，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积极参加还是袖手旁观，反映了人们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世界观。袖手旁观的人所持的立场，正是资产阶级的立场，所以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就是他们的致命伤；而脱离群众、脱

离实际，又使得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真实情况模糊不清，甚至一无所知，助长了他们的偏见，以致当别人告诉他们总路线好得很，大跃进好得很，人民公社好得很，他们也不相信。这样的人，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自然就不可能采取热情的欢迎态度，而只能是摆出冷冰冰的脸孔，怀着无穷的忧虑，指手划脚，大泼冷水。这种人，如果不及早清醒过来，是极危险的。因为从袖手旁观到反党反社会主义，中間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用主人翁的积极态度来对待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却不同。他们夜以继日地用忘我的劳动为社会主义大厦增添一砖一瓦，他们从来就把自己当作亿万建设大军中的一员，他们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休戚相关，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他们感到由衷的喜悦，对于工作中的那怕是很小的损失和差错，他们感到切肤之痛。正因为他们是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参加者，而不是袖手旁观者，他们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真实情况也就一清二楚，不但对于伟大成就毫不怀疑，而且对于工作中的某些缺点也能够有深刻的认识，并千方百计加以克服。

当然，事情是会起变化的。有些人开始时袖手旁观，诸多挑剔，可是到了后来，生活教训了他，使他逐渐感到自己并不是那么“高明”；再加上真心诚意地参加一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到群众中去，思想感情也就逐渐得到改造，屁股也就逐渐由旁观席上转移到主人翁的席位上来。还有一些人则相

反，由热情参加者变为袖手旁观者。前者说明了，谁要是能够改变资产阶级的立场，积极地站到社会主义建设大军的行列中来，他就能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人，对六亿人民的伟大创造怀着火一般的热情。在实际生活中，这种人是不很少的，我们欢迎他们的转变，不能用固定的眼光看他们，而要“刮目相看”。后者说明了，谁要是缺乏革命的坚定性，或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那他就会热情衰退，同党不一心，用冷冰冰的态度来对待党和人民的事业，最后堕落为旁观者。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是一句老话，是人们的生活经验的概括，包含了部分的道理。但是，这只是对某些事务性的关系来说才是如此。如对于一局棋，对于某些个人生活问题的处理，等等。而对于重大的政治问题，比如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来说，你袖手旁观，就无法“清”；你积极参加，时刻同群众打成一片，也就不致“迷”。因为这里牵涉到人们的立场问题。从不同立场出发，对同一客观物事必然得出相异的结论，持有不同的态度。那么，旁观者与参加者既然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场，又怎么能够得出同一立场的“清”呢？这是十分值得我们寻味的事。是积极参加，还是袖手旁观？是热情，还是冷淡？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和态度。我们应当时刻检查自己，看看自己对待社会主义事业的态度如何。我们要永远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当局者”，而不要做“旁观者”。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日



介紹“偉大希望所在”

李昌实

如旭日东升的人民公社，虽然誕生仅仅一年，但已經放射出灿烂的光輝，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由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主編的“伟大希望所在”，就是介紹广东省人民公社一年来的成就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出版，对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和开展保卫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加速社会主义建設的政治思想教育，都具有重大意义。

“伟大希望所在”一书，以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鑄同志的“歌頌人民公社”一文作为代序，其他各篇分別介紹了順德县杏坛公社、两阳县海陵公社、增城县石滩公社、罗定县素龙公社、連阳各族自治县星子公社、韶关市郊樟市公社、花县花山公社和潮阳县棉城公社、东莞县虎門公社、崖县通什紅旗公社等十个公社一年来的成长过程及其輝煌的成就。

陶鑄同志在代序中，热情地歌頌了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在东江，面对着百年来所沒有的特大水灾，人民公社經歷了一场严重的考驗，充分地显示了回天之力，战胜了洪水，迅速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使人民看到，人民公社确是“台风”吹不垮，干旱旱不垮，大水冲不垮，“就是原子弹也炸不垮”的。

陶鑄同志指出，广东省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的一年，是惊天动地的一年，是生产力大发展、人們的精神面貌大改变，社会主义建設发展空前迅速的一年。从一年来的事实中，可以使我們看出，人民公社不但是我国建成社

会主义、而且也是将来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的社会組織形式。从农村工农业生产上看，人民公社既能高速度地增产粮食，又能发展多种經營，从而推动工业的大发展。人民公社化以后，为工业上贯彻土洋結合，大中小結合的方針，开辟了更加广闊的道路，这将会大大加速我国工业化的步伐。而公社工业的发展，对于加速农业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对于供应农村人民生活的需要，将会起重大的作用。人民公社具有一大二公的特点，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实行大协作，统一安排劳动力和調出更多的劳动力。大协作不仅在生产上起了重大作用，而且加强了社員的集体观念，培养了社員的共产主义思想，提高了社員的政治思想觉悟。从公社举办的公共福利事业来看，举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一方面是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生活，使长期来被束縛在家庭事务中的妇女解放出来，增加了大批劳动力；另一方面也在社員思想上起着很大影响。妇女們的精神面貌有着很大改变，过去所关心、所斤斤計較的是自己那个家庭小天地，现在是越来越关心集体的事业了。从分配制度看，人民公社实行供給制与工資制相結合的制度，可以使全体农民得到最可靠的社会保險。同时，这种制度本身还包含着共产主义的萌芽。人民公社公共經濟一定会发展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公社財富的增加，公社里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必然会逐步地发展起来，給国家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这一切都充分地說明，人民公社

是使农村的社会物质财富迅速增长的泉源，是使人们政治思想水平不断提高的学校，是共产主义萌芽得以成长壮大的园地。这正是使我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组织形式，是我们的伟大希望所在。

陶鑄同志在代序中最后有力地駁斥了帝国主义者和各种反动派对人民公社的无耻污蔑和恶毒的造謠，指出人民公社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駁斥了所謂“人民公社垮台了”和“名存实亡”等謬論，雄辯地說明广东省的人民公社从开始到现在，一个也沒有少，一个也沒有垮。經過特大洪水灾害，反而使人民公社鍛炼得更加坚强壮实了。

“伟大希望所在”一书介绍的十个人民公社，是全省一千一百多个人民公社的縮影。这些公社，有的在山区，有的在沿海，有的在丘陵地带，有的在平原，有的在少数民族地区。总之，不論在任何一个角落，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已經在领导生产、组织生活中，日益充分地显示出来。这十个公社的事实，充分地証明了人民公社是有极其广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的，它是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那些把人民公社、大跃进說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在这庄严的事实面前，已經彻底地破产了。

公社化以后，由于人多力量大，許多过去农业社不能办到的事，都能办到了；許多不能解决的矛盾，都能解决了，特別在大规模改造自然，进行农田基本建設方面，显得非常突出。本书所介绍的杏坛公社，由于实现公社化能够大兴水利工程的事例，是很有代表性的。杏坛公社位于珠江三角洲的河网地带，是种植经济作物的好地方。但是，历来都受浸、受旱。解放以后，情况虽然有了好轉，可是要全面控制排灌，蓄水抗旱和排除低地积水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想修一座

大水閘，和一些中小型水閘，都因为劳力不足，資金困难，无法办到。公社化以后，由四十四個农业社，六万五千多人，合成一个公社，人力、財力、物力都解决了。一座大水閘和十一个中小型水閘很快就兴建起来；还进行开河疏沟，堤围加高培厚，使低地积水得以排除，不怕水、旱灾害的威胁了。公社还組織了一万八千个劳动力，分十三个“作战区”，大规模进行平整土地，改造魚塘，改造低产田，开荒扩大耕地面积，給全面发展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此外，如本书所介绍的星子公社和棉城公社的大力兴办水利建設事业的例子，都充分說明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讀了之后，令人极为兴奋。

从这十个公社的介绍中，都可看到，公社化后，为大力发展公社工业，开辟了广闊的道路，从而使社办经济得到迅速壮大。在这方面，樟市人民公社給我們提供了极其鮮明的例子。公社经济力量的壮大，給生产比較落后的穷队以很大帮助，使他們改变落后面貌，促进各个大队之間经济发展的平衡，这种作用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从全省唯一实行公社基本所有制的花山公社，也可以看出社办工业迅速发展情况和社办经济的巨大作用。这就使我們能够清楚地看到，公社一級所有制经济是人民公社伟大未来的基础。

广东今年遭受了百年来所未见的特大洪水的侵袭，东江沿岸的人民公社經受了严重的考驗，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抗拒自然灾害的回天之力。本书所介绍的石滩公社抗洪搶險、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的事例，是很有代表性的。当特大洪水到来的时候，石滩人民公社發揮了人多力量大的优越性，全社組織了1万7千个劳动力，編成前綫、机动、后勤等战斗单位，紧张开展抗洪斗争，全公社五万多人，沒有淹死一人。受灾以后，公社迅速进行堵口复堤，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工作。在公社統一领导下，进行了大协作，充分挖掘了现有人力、物力的潜力，依期完

成堵口复堤的工程。在晚造插秧的时候，公社从田少人多的大队，抽调一千多个劳动力，去支援田多人少的大队。公社还发动三千二百个女劳动力下田插秧。因此，整个公社甚至能比去年提前一个节令完成了插秧任务，这就为晚造大丰收，打下了可靠的基础。同时，灾后曾经一度出现的几种疾病，也得到迅速消灭。中小学、卫生所、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等，也能迅速恢复，倒塌的房屋，也将在春节前，全部重建起来，最后彻底地消灭灾痕。

“伟大希望所在”一书，还以非常丰富和具体的材料，给我们指出了公社化给广大农民生活带来的好处。社员增加了收入，贫穷面貌迅速得到了改变。如从素龙人民公社的介绍中，就可以看到，人民公社给历史性的重灾区，带来了莫大的幸福。这个地区过去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三天不雨一小旱，五天不雨一大旱”。解放以后，实现了合作化，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群众生活也有很大改善。但是，由于合作社的规模小，人少势弱，灾区面貌依然没有能够根本改变，生产、生活的水平依然很低。公社化以后，由公社投资，修建了高级社时难以举办的水库和排灌站，解决了水利问题，使生产出现了大跃进。粮食生产迅速增长，不仅不再要国家供应口粮，而且，今年早造还为国家提供了384万斤的商品粮，社员口粮也比去年早造增加了55%。社员的收入有了很大提高，今年早造的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了84%，相当于1957年全年收入的一倍。全社没有一户减少收入。现在是人心向社，安心生产，过去因为生产、生活不稳定而外出的人，都回来了。在不久以前，曾经有人怀疑过，在灾难重重、贫穷落后的地区，能否办好人民公社？素龙人民公社活生生的事实，就给这些怀疑派以最有力的答复。

在少数民族的黎族地区，同样也可看到，人民公社给少数民族的人民，带来了说

不完的好处。崖县通什红旗人民公社，过去人民生活非常贫苦，耕作粗糙，产量很低，解放以后，实现了合作化，情况有了很大改变。但是，要根本的改变，只有公社化才能做到。公社化以来的一年间，这个原来非常落后的地区，无论在农业生产上或工业生产上，都发生了惊人的巨变，迅速地提高了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如番茅大队毛总生产队，共29户，在公社化前，除一户外，都欠国家贷款，现在不但把贷款全部清还了，而且户户都在信用社存了款，共有存款673元，平均每户23元多。一年来，全队人人都添了新衣裳，少的一套，多的三套，冬天都有卫生衣或棉衣。有二十二户还添置了蚊帐和棉被。同时，人民也注意讲究卫生，一年来，疟疾、天花、霍乱和初生婴儿的破伤风等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已被消灭。所有这些事例，都说明了人民公社在改变农村贫穷面貌，增加社员收入方面的巨大力量。

公社化后，公社实行了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同时大办公共福利事业，广大社员都热烈拥护，特别是贫农和下中农的困难户。这种分配制度使他们不愁吃喝，这就使广大社员有了最可靠的社会保险。杏坛公社，自从公社化后就一直坚持了这种分配制度，实行了伙食供给制。工资部分和伙食供给部分，各占分配总额的60%和40%。该社根据目前生产发展，伙食供给每人每月平均4.5元，每个劳动力每月平均工资23元。实行这一制度以后，超支户就完全没有了。在公共福利事业方面，公社化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现在，这些事业，已是越来越巩固，越提高，越受到群众的欢迎了。如虎门公社的公共食堂，现在就已办了254间，参加人数占总人口的93%。由于各方面都能尽量方便群众，又能进一步解放妇女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

总之，“伟大希望所在”一书的内容非

常丰富，是一本具体生动的教材。从中我们可以吸取许多宝贵的知识和经验，特别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对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和无穷生命力，有深刻的、具体的认识，从而可以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我国六亿人民这一伟大创造的重大意义和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正确，克服右倾思想，更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拥护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保卫人民公社。我们必须认识到，两个

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都是不可避免的，就象波浪的起伏一样，有时高，有时低，有时表现尖锐，有时表现比较缓和。有右倾思想的人，应当从中得到教益，划清界线，端正立场，改造思想。因此，“伟大希望所在”一书，值得广大干部认真阅读。对广大群众来说，也同样是一本政治教材，是一本很有益的书。我们热烈欢迎“伟大希望所在”一书的出版。

中山大学热烈举行科学讨论会

为检阅大跃进以来科学研究的总成绩，中山大学举行了第四次科学讨论会。这次讨论会从十一月十八日开幕到十二月七日这一段时间内，各系、室已分组进行了64项论文讨论。参加讨论会的科学论文共计有124篇，其中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67篇，属于社会科学方面的50篇，体育方面的7篇。这次讨论，说明一年多来该校在科学研究中是贯彻了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为教学服务的正确方针的。讨论项目结合生产35项，结合教学的64项，结合当前政治运动的12项，此外还有13项专著研究。已经过讨论的社会科学方面的20个项目中，密切结合当前政治运动、学术思想和教学实际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的“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奋勇前进”、“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的运用和发展”；中文系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和特点”、“构成李白积极浪漫主义的因素”、“三家巷的艺术魔力”、“略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广东民歌”；历史系的“周敦颐思想研究”、“广东原始社会的探讨”、“十年来的中苏友谊”等等。

讨论会充分发挥了“百家争鸣”的精神，论文作者都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参加讨论的同志也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争论往往是十分热烈的。例如，历史系讨论杨荣国教授的论文“周敦颐思想研究”时，大家认为这篇论文对于批判冯友兰先生的新儒学唯心主义观点有所贡献，但作者认为周敦颐的哲学思想是客观唯心主义的，梁方仲、戴裔焯两位教授则认为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倾向。

目前，讨论会正在继续举行，准备讨论的重要论文还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论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辩论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区别”、“毛泽东语言风格研究”、“陶渊明研究”等。在十二月九日全国学生运动纪念日举行的第二次大会上，讨论了“中山大学学生运动简史”，这篇长达十万字的论文是由该校历史系1959年级学生集体编写的。（平）



教育革命好得很

——駁“吃虧”論

中山大學中文系四年級學生 裘漢康

整風反右以後，我們學校大力貫徹了黨的教育方針，在總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學校掀起了裏裏烈烈的教育大革命和群眾性的科學研究活動，學校面貌煥然一新，同學們自覺革命的要求普遍高漲，大多數同學都以滿腔的熱情投身到各項政治運動和勞動的熔爐之中，做“火鳳凰”，是他們共同的決心和願望。但是近半年來，在右傾機會主義思潮的侵襲下，一些人原有的資產階級教育思想、辦學觀點又死灰復燃，他們對教育大革命的偉大成就，由懷疑、動搖到抱著否定和不滿的態度。某些原來比較堅定的同學，也有些動搖，對於還要不要堅持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也發生某些懷疑。

於是，在四年級的同學中，就出現這樣一種論調：“唉！怎麼不前不後，正好我們進大學就大改革，弄得我們沒有讀到什麼書，真是吃大虧，……”。原來我們這一屆自1956年入學以來，照有的人講法，“太平年月”不到一年光景，後來就是一個運動接着一個運動，一次改革又來一次改革，加上勤工儉學，大規模下鄉，回到學校又繼續搞獻禮，……聽說下學期又要集中勞動一個半月，於是不少人更緊鎖雙眉，“吃虧”論也就更有市場。據說，還有人作了這樣的計算：我們這一屆從入學到畢業，實實在在用來讀書的時間只有兩年左右，用這些人的說法：“四年制變成了兩年制”。由此他們

得出結論是：“勞動妨礙了學習，政治活動影響了教學質量”，認為書讀少了，質量下降了。

果真如此嗎？回答是否定的。在這裡，讓我們先來看事實吧！

回想在整風反右以前，我們四年級一百二十多同學，幾乎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脫離政治的傾向。有些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很嚴重，堅定地走着白專道路。那時，脫離實際，“厚古薄今”的歪風很盛；有些人嚮往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羨慕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輕視勞動，輕視勞動人民，同組織鬧對立，甚至對黨、對社會主義制度心懷不滿，其中頑強地堅持資產階級立場、觀點的少數人，在整風反右中成了資產階級右派。可是，我們看看今天，除了被歷史淘汰的那些人以外，都在政治鬥爭和生產勞動中得到了鍛煉和提高。通過歷次政治運動，通過煉焦、煉鋼、下鄉和農民“三同”，我們不僅學到了許多生產勞動的知識和技能，增強了體質，而且更重要的是：社會主義覺悟提高了，階級觀點，勞動觀點，群眾觀點增強了。農民同志們充沛的勞動熱情，鮮明的階級觀點教育了我們，我們開始懂得勞動人民的心，也認識到我們的學習，正是為了將來更好地為這些勤勞善良的人們服務，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過去看不起勞動人民的人，現在開始對他們發生了感情，許多同學都放下了知識分子的架子，跟老鄉們結成

了亲密的友谊；过去一心向往当资产阶级专家的人，现在决心做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我们中的许多人，真正地把自己同广大劳动人民、同社会主义祖国的命运扭在一起。半年多以来，我们四年级有过半同学提出了入党入团的申请，其中有的已经成为了光荣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教育大革命带来了同学们政治思想面貌的巨大变化，这是大搞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的显著的成就，也是在无产阶级看来，教育质量提高的最重要方面，我们在这方面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能够说是质量下降吗？

就是在智育方面，也就是在结合实际，联系生产的全面的知识学习方面，我们通过教育大革命，质量也有了显著的提高。简单地归纳起来就有：

第一，没有大搞劳动和政治运动之前，我们的学习领域，除了上课，就仅仅局限在老师指定的几本参考书和笔记本的小圈子里。可是，这二年我们通过炼钢、炼焦、种菜种瓜、特别下乡秋收、深耕，以及经历几次大的政治运动，除了树立了阶级观点、劳动观点和开始建立了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以外，还学到了许多课堂上所不能学到的联系生产、结合实际的知識，积累了一些非常有用的实际材料。并且通过群众性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和政治运动的教育，我们解放了思想，批判了资产阶级学术观点，不再“厚古薄今”，迷信权威，也不再是“两耳不闻校外事，闭门只读线装书”；同时，由于直接参加拟订教学大纲，编讲义，写批判文章，编“虎门公社史”、“华南十年文艺思想斗争史”、“粤剧总纲”和校勘“六十种曲”等等，读了比教师规定的必读参考书要多上十几倍的书。此外，我们近年来还参加了当前文艺界、学术界关于“文学史主流”、“古典作品的評價”、“文学艺术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等重大学术问题和其他许多学术问题的讨论，并结合这些讨论写出了

上百篇有一定质量的论文和作品，其中有些已经发表。这样把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和实际生活结合起来，扩大了学习领域，丰富了学习内容，使我们对书本知识体会更加深刻，真正变成为自己的东西。能说这不是提高，而是降低质量吗？

第二，我们提高了辨别香花与毒草的能力。在没有大搞教育革命以前，我们虽然学到了一些理论知识，但不能运用，有不少人还不能识别香花和毒草，如右派分子公刘的一首诗“姑娘在河滩上逗留”，当时有的报刊错误地把它捧得很高，我们也就天天挂在口边；直到反右斗争开始时，还有人欣赏象“美丽”、“红豆”这类的毒花毒草（转载五七年七月号《人民文学》）。可是我们现在不再这么容易受骗了，并且能较深入的通过形象的分析揭示作品的本质。再象我们上学期讨论杜鹏程的著名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如果没有经过下乡亲身参加秋收苦战或者直接参加兴修水利、大搞深耕、大炼钢铁等，那么小说中所着力描写的工地广大职工的冲天干劲、英雄人物比火还热的内心及惊心动魄的群众性赶修工程的场面，是很难深切理解的；要写文章分析这部作品的价值，也很难深入透彻。到底是搞劳动影响了学习质量，还是有助于质量的提高呢？这不正好是个证明吗！

第三，在改革以前，我们的课堂讨论、考试测验的基本特点可以用十六个字加以概括：“照念讲义、死记条文、到时应付，过后忘记”。可是上学期的几次课堂讨论却没有一次不是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有的还能针对老师的意见展开争论，而且大多言之成理、言之有物，好些同学入学以来，很少做发言提纲，上学期却有了详细的发言提纲和读书笔记，主动的学习使大家感到收获很大。从考试成绩看，以文学史为例，不仅出现了三年来第一次全年级没有一个不及格的景象，更可喜的是答卷大都有自己的见解和较深刻的体

会，老师们一致认为几年来考得最好的一次，有些试卷略加整理，就可以称是一篇有份量的文章。这就说明，教育大革命以后，我们的学习面貌和成绩，都有很大的改变和提高。更可贵的是独立思考、独立工作能力提高了，这些都不是多读一本两本书所能相比的了。

第四，下乡回来以后，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学习是赶得比较紧些，有些课暂时没有开或者内容压缩了一些，这些都是事实。但是从实际出发、从主要的方面来看，决不能因此得出“学少了，吃亏了”的结论。相反，正如有的同学讲的：“平心而论、倒是入学以来，读得最多的一个学期。”过去我们学习文学史，一个学期只读某一阶段的几十首（篇）诗文，再加为数极少的论文。可是上学期我们年级据初步统计，平均每人读了一百五十首以上的宋诗宋词、约二十种元杂剧、大部头的明清小说或戏剧约五本，另外每人还平均阅读了有关参考资料共约三十万字（有的多到五十万字）。其故安在？答曰：正是因为搞了劳动和政治运动，我们的学习目的、观点明确了，态度端正，劲头十足，方法也对头的缘故！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不仅数量上读多了，而且所学到的知识的正确性、科学性及掌握这些知识的扎实程度，比起过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例如学了宋元文学，我们就和过去不一样，没有沉浸在“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境界里，相反我们从陆游、辛弃疾、岳飞等人的爱国诗篇词章及关汉卿等剧作家的战斗性很强的戏曲中，得到了莫大的鼓舞与启发，对过去一些为人不重视的思想性较强的作品，我们比较注意了，而对前人所全盘肯定的柳永等人词章中的健康部分、马致远等人杂剧中的消极成分甚至反动落后的思想因素，我们初步进行了分析批判。这样，我们不仅学多了，而且学对了、学好了，学了对人民有用。能说这是吃亏吗？可能在某些具体资料上，我们是掌握少了些，但有些本来是没有价值的，有些我们在有了

观点正确以后，再去研究它，不仅是可以的，而且也才有效。这也不能算是吃了什么亏。

此外通过教育大革命，老师的政治思想面貌也起了很大的变化。不少老师的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更加自觉的靠攏党，争取党的领导和帮助；积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教学思想和教学观点上，也有了不小进步，“厚古薄今”、“重艺术轻政治”的倾向得到进一步克服；又加以老师们重视了集体研究，集体备课，而个人备课也比过去更加严肃认真，因此教学的思想性加强了，教学内容也进一步充实了。许多老师不仅经常到同学宿舍来解答我们学习中的疑难问题，勉励我们主动地、艰苦地学习，而且还听取大家对教学的意见，吸收同学代表参加备课组讨论，同学们也经常到老师家中去访问请教；在学术问题讨论中，师生一起展开热烈的争论，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的空气空前活跃。有的老师一方面能够考虑同学提出的意见，另一方面又能从追求真理出发，讲出自己的看法。民主平等的、教学相长的新的师生关系逐步形成，师生之间在党的领导下，关系更加密切。这样就有力地推动了学校教学工作的改进，从而大大地提高了教学质量。从这一方面也可以充分说明我们处在大改革时期受益不少，而不是吃了大亏。

所以从我们这一届的实际情况来看，“吃亏”论是站不住脚的。过去有人不通，现在还有人这样看，只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教育观还在一部分人头脑中起作用，而他们自己又放弃了政治挂帅这个原则的缘故。因此我们说：在学校里大搞劳动好得很，大学生参加政治运动好得很，教育革命好得很！党的教育方针好得很！当然我们并不能以此为满足，考虑到党和人民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更上一层楼，加倍努力从各方面提高自己。让我们坚决反掉右倾思想，再一次在党的红旗下、在劳动的号角声中集合，奋勇前进，永远前进！

稿 約

(一) 本刊歡迎投稿。

(二) 本刊歡迎下列稿件：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觀點和社會科學原理闡述我國當前政治上、思想上、學術上的重要問題；闡明毛主席著作的研究論文、讀書筆記和學習心得；批判資產階級的哲學思想、社會科學理論等方面的研究論文；通俗闡明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和社會科學基本問題的著作；華南地區的科學研究資料和學術性調查材料；國內哲學社會科學著作評介。

(三) 本刊在最近時期內特別需要下列稿件：學習黨的八屆八中全會文件的心得，特別是批判我國當前右傾機會主義思潮的論文；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問題，如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我國國民經濟全面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有關重大理論問題等；工農學哲學的體會和學習心得，以及關於工農學哲學的普及與提高的經驗或論文。

(四) 本刊文字以語體文為主，內容要求密切聯繫實際，言之有物；稿長一般不超過五千字。來稿請用稿紙繕寫清楚，並示真名及詳細地址（發表時筆名聽便）。不擬採用的稿件，負責退還。由於來稿日多而本刊編輯部人力有限，退稿一般不提意見，請作者見諒。

(五) 來稿發表後，即奉稿酬。

(六) 來稿請寄：廣州市越秀北路 222 號中國科學院廣州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內“理論與實踐”編輯部。

理论与实践 1959年1—12期总目录

(括弧内前一数字为期数, 后一数字为頁数)

政治思想

- 試論我国当前的农民同盟軍問題 丽石 (2.5)
- 胜利的凱歌, 进軍的号角 杜国庠 (3.1)
- 欢呼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伟大成就
- 跃进的計划, 战斗的号角 本刊編輯部 (9.1)
- 大跃进的伟大成就和意义不容抹煞 继迅 (9.3)
- 論“鼓气” 陈盈 (9.24)
- 在高速度問題上我們与右傾机会主义者的分歧 丘子江 (10.33)
- 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 严克柔 (10.39)
- 当前右傾机会主义思潮的阶级根源及其危害性 龙世雄 (10.43)
- 試論国民經济的战略平衡 梁剑 (10.47)
- 駁所謂“国民經济比例失調”的謬論
- 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胜利前进 馮乃超 (11.1)
- 坚持总路綫, 保卫总路綫 张榆 (11.4)
- 不断革命論是反对右傾机会主义的銳利武器 严克柔 (11.11)
- 阶级斗争沒有熄灭 李又华 (11.16)
- 駁所謂“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运动” 陈慧道 (11.20)
- 坚决做无产阶级革命派 杜国庠 (12.1)
- 坚决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杨奎章 (12.12)
- “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欺騙性 张进 潘擷 馮訓瑜 (12.17)
- 坚决挖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张涛 謝炳生 (12.21)

哲 学

- 論两个过渡 严克柔 (1.1)
- 我們怎样做工人学哲学的巩固和提高工作 曹平凡 (1.22)
- 評“美是什么” 温莎 (1.25)
- 个别与一般的辯証关系 燕丘 (1.27)
- 批判罗克汀的唯心主义和修正主义哲学 章良潮 (1.33)
- 我国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标志 梁克 (3.22)

| | |
|---------------------------------|---------------|
| 坚持学哲学 | 朱济灵 (3.25) |
| ——介绍广州益丰搪瓷厂工人学哲学的初步经验 | |
| 学哲学, 用哲学 | 周树泉 (3.27) |
| 一定要学好理论 | 刘启扬 (3.29) |
| 再论陈白沙的哲学思想 | 章沛 (4.46) |
| 谈谈工作方法问题 | 龙世雄 (5.18) |
| 两条腿走路与唯物辩证法 | 王道一 (5.23) |
| 观察形势, 当机立断 | 万发云 (6.20) |
| 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学习运用辩证法 | 杜国庠 (7.1) |
| 毛主席矛盾学说的光辉 | 求真 (7.5) |
| 多谋善断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 张江明 (7.12) |
| 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 |
| 发表两周年座谈发言(摘要) | 古子坚等 (7.16) |
| “实践论”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 鍾夏 (8.1) |
| 学会客观地看问题 | 吴枫 (8.8) |
| 谈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 东行 (8.11) |
| “波浪式”发展的必然性 | 兰云 (8.14) |
| 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一致 | 王致远 (10.51) |
| 张载的唯物思想(上) | 杨荣国 (10.57) |
| 大众逻辑学讲话(第一讲) | 李匡武 (10.79) |
| 张载的唯物思想(下) | 杨荣国 (11.26) |
| 大众逻辑学讲话(第二、三、四讲) | 李匡武 (11.39) |

庆祝建国十周年

| | |
|-------------------------|---------------|
|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 刘少奇 (10.2) |
|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 | 杜国庠 (10.14) |
| 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继续前进 | 戈枫 (10.16) |
| 进一步开展经济学界的学术活动 | 王全国 (10.18) |
| 为历史科学的大跃进欢呼 | 杨荣国 (10.19) |
| 进一步开展教育学的学术活动 | 饒璜湘 (10.21) |
| 作好党培养和组织理论队伍的助手 | 孙孺 (10.22) |
| 欢呼在党的领导下教育事业的胜利 | 許崇清 (10.24) |
| 高等教育事业大跃进中的一朵红花 | 梁奇达 (10.26) |
| 党的教育方针的伟大胜利 | 王燕士 (10.28) |
| 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民教师 | 张海鰲 (10.30) |
| 为培养更多更好的中等教育师资而奋斗 | 杜伯奎 (10.31) |

人民公社

| | |
|----------------------|-------------|
| 人民公社是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 | 陈迅之 (1.5) |
|----------------------|-------------|

| | |
|--------------------------------|--------------|
| 关于人民公社当前的分配制度 | 孙 孺 (1.8) |
| 論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 | 陈文川 (1.12) |
| 从三元里人民公社的情况談公社分配的几个問題 | 集 群 (2.11) |
| 談当前人民公社的产品分配 | 继 迅 (6.7) |
| 人民公社好得很 | 陈国璋 (9.9) |
| 輝煌成就的一年 | 何木連 (9.13) |
| 历史是最好的见証人 | 吳 修 (9.17) |
| ——从新会环城人民公社建立前后的一些材料駁斥对人民公社的污蔑 | |
| 人民公社伟大未来的重要基础 | 吳 修 (12.5) |
| ——从樟市公社社办經濟和福利事业看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的伟大前途 | |

資 产 阶 級 法 权 問 題

| | |
|--------------------------|----------------|
| 广州学术界座談資产阶級法权問題綜述 | 本刊編輯部 (1.37) |
| 正确对待破除資产阶級法权残余問題 | 李超桓 (1.39) |
| 对破除資产阶級法权残余問題的一点意見 | 龙世雄 (1.41) |
| 資产阶級法权残余的主要表现 | 魏双凤 (1.41) |
| 实行按劳分配符合我国社会的发展規律 | 譚超白 (1.42) |
| 对資产阶級法权残余的看法 | 黃家駒 (1.42) |
| 一点补充修正 | 何 城 (1.44) |
| ——关于如何对待資产阶級法权残余問題 | |

学 术 思 想 批 判

| | |
|----------------------------------|--------------|
| 青年学生参加学术思想批判的意義 | 王威宣 (1.19) |
| 批判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講稿 | 杨荣国 (2.37) |
| 評岑仲勉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化(包括封建制度)来自突厥說 | 胡少华 (2.41) |
| 批判心理学研究中的資产阶級方向 | 阮鏡清 (2.45) |
| 从“明代粮长制度”看梁方仲先生的唯心史观 | 湯明燧 (3.30) |
| 自我批判和答辯 | 刘 节 (7.47) |

經 济

| | |
|----------------------------------|--------------|
| 論工业战綫的群众运动 | 杨 繁 (1.15) |
| 关于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問題 | 孙 孺 (2.1) |
| 客观經濟規律只能运用不能消灭 | 唯 思 (2.8) |
| 充分發揮商品生产和价值規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积极作用 | 卓 群 (3.5) |
| 积极地利用商品生产与价值規律 | 陈应中 (3.8) |
| 商品生产是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現 | 馬 雷 (3.11) |
| 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規律座談发言摘要 | 易风等 (3.13) |
| 論高速度 | 陈迅之 (4.1) |
| 論我国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 孙 孺 (4.30) |

| | |
|--------------------------------|------------------|
| 試論价值規律对社会主义生产的調节作用 | 方培俊 (4.36) |
| 价值規律对我国商品生产和流通基本上不起調节作用 | 謝南石 吳鑑然 (4.40) |
| 价值規律在資本主义社会也不起生产調节者的作用嗎? | 郑芝材 (4.43) |
| ——与何正同志商榷 | |
| 积极开展經濟理論的研究工作 | 梁 嘉 (5.1) |
| 增产節約是建設社会主义的基本方法 | 严克柔 (5.5) |
| 关于按劳分配与政治挂帅問題 | 杨 樾 (5.9) |
| 全面認識和正确利用計件工資制 | 陈文川 (5.26) |
| 对取消計件工資問題的一些看法 | 李 中 (5.31) |
| 再談国营企业間生产資料的交換关系 | 孙 孺 (5.35) |
| 正确認識和运用国民經济有計劃按比例发展規律 | 雷 明 (6.1) |
| 論認識和运用社会主义經濟規律問題 | 严克柔 (7.26) |
| 談談学点政治經济学 | 孙 孺 (8.16) |
| 关于国民經济发展的速度和比例問題 | 王冕农 (8.19) |
| 略談速度与比例的辯証关系 | 仲 境 (8.26) |
| 高速度与按比例关系問題的探討 | 陆大同 (8.31) |
| 經濟規律的客观性和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 若 文 (9.40) |
| 社会主义經济发展的速度与比例問題 | 曾野夫 (9.44) |
| 按劳分配原則有沒有两面性? | 董 琦 (9.49) |
| ——与杨樾同志商榷 | |
| 也談按劳分配与政治挂帅 | 廖庆薪 (9.52) |
| ——对杨樾同志“关于按劳分配与政治挂帅問題”一文的意見 | |
| 广州市场的回顧与展望 | 陈 克 (12.24) |

文化、教育、科学、文学

| | |
|-------------------------------|-----------------------|
| “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对我国教育科学的重大貢獻 | 张其光 (2.14) |
| 論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方針与实用 | |
| 主义反动教育观点的根本区别 | 李共水 (2.17) |
| 党的教育方針的胜利 | 中山大学历史系总支委员会 (2.21) |
| ——东莞劳动百日的收获 | |
| 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意义 | 黃熙良 (3.20) |
| 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 | 林 遐 (4.17) |
| ——学习“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結合”筆記 | |
| 从宋詞里接受有益的东西 | 王季思 (4.22) |
| 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 | 王威宣 (4.26) |
| 坚持“理論与实际相联系”的学习原則 | 梁 克 (5.15) |
| 論人民教师的地位和作用 | 张其光 (6.11) |
| ——兼談应屆高、初中毕业生投考师范专业問題 | |

| | |
|--------------------------------|-----------------|
| 从知識发展的规律性談学校学习的几个問題 | 王威宣 (6.16) |
| 全面地历史地評价苏軾 | 艾治平 (6.23) |
| ——对“苏軾試論”与“几点意見”的意見 | |
| 工人学理論的方法問題 | 集 名 (6.38) |
| 怎样正确理解理論联系实际的原則 | 房松 郑凌华 (6.42) |
| ——与梁克同志商榷 | |
| “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方針的伟大胜利 | 杨 群 (7.9) |
| 对工农群众理論学习方法問題的看法 | 朱济灵 (7.37) |
| 以什么为中心, 从哪里出发? | 曾树材 (7.38) |
| 先精通然后才能运用嗎? | 王 琴 (7.40) |
| 怎样解决人民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內部矛盾 | 許崇清 (8.34) |
| 教学中理論与实践的关系問題 | 方惇頤 (8.37) |
| 如何理解“理論联系实际”的原則 | 廖 之 (8.45) |
| 把工人的理論学习提高一步 | 丘 山 (8.47) |
| 略談理論与实际相結合問題 | 王致远 (9.27) |
| 論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 | 郑 淳 (9.31) |
| 对王季思先生“从宋詞里接受有益的东西”一文的意見 | 裘汉康 (9.35) |
| 关于心理科学若干問題的討論 | 吳江霖 (10.67) |
| 从柳永的三首詞談到有关古典文学評价的問題 | 王 起 (10.75) |
| 試論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質及其长成 | 吳宏聰 (12.36) |

历 史

| | |
|---------------------------|-------------------------|
| 略論中国封建社会內部分期問題 | 百 石 (4.6) |
| 关于研究明末农民战争的一些意見 | 姚定九 (4.12) |
| 对打破王朝体系問題的看法 | 尙 同 (4.15) |
| 試論中国封建时代历史的分期 | 关履权 (5.39) |
| “五·四”运动在广东 | 胡希明 (5.45) |
| 应该如何評价曹操 | 戴裔煊 (6.27) |
| 試論明代矿业中資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及特点 | 李龙潜 (6.32) |
| 略論中国农民战争历史的发展规律 | 唐陶华 (7.42) |
| 明清时代佛山經濟的初步研究 | 陈学文 (8.40) |
|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及其发展問題 | 董家遵 (10.62) |
| 明正統年間广东黃肖养的起义 | 李龙潜 (11.33) |
| 广东原始社会初探 | 中山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研組 (12.29) |

民 族

| | |
|---------------------|--------------|
| 論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族关系 | 刘 渠 (7.31) |
|---------------------|--------------|

短 論 与 随 笔

| | |
|---------------------|---------------|
| 猫和花 | 秦 牧 (1.45) |
| 宇宙火箭与紙老虎 | 于燕郊 (1.46) |
| 大小之間 | 何家言 (2.51) |
| 迷信与科学 | 夏 枫 (2.52) |
| 小論“启发” | 于燕郊 (3.33) |
| 吃飯、穿衣和文艺、詩 | 温 莎 (3.34) |
| 讀“师說”偶感 | 鍾 夏 (4.51) |
| 制度·思想·教育 | 云 阶 (4.52) |
| 前后之間 | 何家言 (5.50) |
| 漫談讀書 | 刘启扬 (5.51) |
| 提倡活讀書 | 章 沛 (6.46) |
| 幽灵在徘徊 | 岑 桑 (6.46) |
| 談“事后諸葛亮” | 杜守素 (7.51) |
| 路綫·方法·干劲 | 賀 青 (7.53) |
| 当心那个“一小步” | 于燕郊 (8.50) |
| “用兵新法”的启示 | 曾牧野 (8.51) |
| 正确对待先进經驗 | 参 言 (8.52) |
| “好得很”和“糟得很” | 杨奎章 (9.55) |
| 为新生事物鳴鑼开道 | 田 牧 (9.57) |
| 乐观·信心·毅力 | 丘谷間 (9.59) |
| 能动性 with 实事求是 | 何 白 (9.60) |
| 撫今思昔庆佳节 | 陈一百 (10.82) |
| 九斤老太的唠叨 | 燕 如 (10.83) |
| “借东风”及其他 | 賀 青 (10.84) |
| 清鼠糞，割毒瘤 | 燕 如 (11.45) |
| 貝克萊的翻版 | 黃展鵬 (11.46) |
| “同路”与“挡路” | 刘启扬 (11.48) |
| 小論个人主义的品种 | 燕 如 (12.45) |
| 热情与冷淡 | 賀 青 (12.47) |

书 刊 評 介

| | |
|------------------------------|---------------|
| 第一部紅色“中国文学史” | 艾治平 (2.48) |
| ——評北大中文系文学專門化55級集体編著的“中国文学史” | |
| 評介“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 朱玉德 (6.51) |
| 介紹“伟大希望所在” | 李昌实 (12.49) |

讀者 中 來

- 对资产階級知識分子进一言合 群 (1.48)
- 关于腦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一些看法余 璜 (2.53)
- 我看到了农民学哲学的好处黄义祥 (2.54)
- 必須坚持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规律的学說何梦弃 (4.54)
——駁何正关于馬克思主义价值规律作用問題的发言
- 对“重談‘改造我們的学习’的一点体会”的意见.....鞠健生 (5.53)
附：孙冰同志的复信
- “两种价值轉移”的論点是錯誤的徐鉄騫 (7.55)
附：梁克同志的来信
- 教育革命好得很裘汉康 (12.53)
——駁“吃亏”論

資 料

-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論“资产階級式的法权” (1.50)
- 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性質問題的討論 (2.55)
- 新会县环城人民公社商品生产的情况調查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所农村人民公社調查組 (3.37)
- 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問題的討論 (3.42)
- 关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問題的討論 (3.47)
- 人民公社化后官塘的新面貌中共南村人民公社党委会办公室整理 (11.50)

笔 談

- 貫徹党的教育方針与参加教学改革的心得.....王越等 (2.25—35)

問 題 解 答

- 为什么我国經濟学界目前要广泛展开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討論 (3.36)
- 为什么要开展第三类物資交流张思强 (6.49)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主办

上游 半月刊

1959年
第23期

| | |
|---------------------------|-----|
| 工业支援农业是工农业全面迅速发展的关键 | 魏南金 |
| 大力提高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 程里 |
| 办好公社工业是农业继续大跃进的重要保证 | 韩培光 |
| ——介绍锦山公社办工业的经验 | |
| 做好深耕改土工作，夺取明年更大丰收 | 林若 |
| 略谈提高教学质量 | 刘昆林 |
| 小 谈过关 | 贺青 |
| 文 小与大 | 关与 |
| 章 赞美练江水闸 | 绍贤 |
| 漫谈治学 | 陈心陶 |
| 封面木刻（木棉花） | 张信让 |

本期十二月十日出版 每册定价一角

订閱处：各地邮局 零售：各地新华书店

理论与实践

月刊

1959年第12期（总第24期）

編輯者：理论与实践編委会

广州越秀北路222号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大南路43号

1959年12月25日出版

印刷者：广东人民印刷厂

发行者：广东省广州市邮局

預訂处：全国各地邮电局、所